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戰國策》修辭研究

Zhan Guo Ce Rhetorical Analysis

哈偉爾

Javier Caramés Sánchez

指導教授：李隆獻教授

Advice Prof. : Lee Long-Shien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五月

May, 2014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戰國策》修辭研究

Zhan Guo Ce Rhetorical Analysis

本論文係哈偉爾君（R99121026 學號）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李隆獻

（簽名）

（指導教授）

張高評

張壽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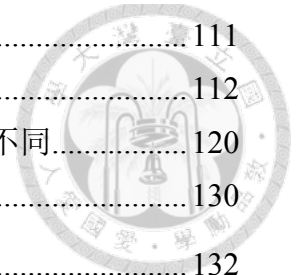
目次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修辭義界	1
一、中華修辭觀	1
二、古希臘修辭觀	5
第二節 前人研究述略	6
第三節 本文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論題	13
一、研究方法	13
二、本文討論的問題	14
三、研究資料	15
第二章《戰國策》修辭性質論析	17
前言	17
第一節《戰國策》的文章結構	19
一、一般的結構	19
二、提出勸說過程的章節	21
第二節 重點在遊說的篇章	24
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	24
二、〈鄒忌脩八尺有餘〉	28
第三節 重點在敘述的篇章	30
一、〈韓傀相韓〉	30
二、〈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	33
三、〈齊人有馮諼者〉	37
第四節 結語	39
第三章 亞里士多德《修辭學》中的「情緒」(πάθος)觀與戰國時期似類概念	41
前言	41
第一節 亞里士多德、韓非子及鬼谷子的「情緒」概念	41
一、亞里士多德《修辭學》中的「情緒」概念	42
二、韓非子〈說難〉中的「心」概念	45

三、鬼谷子〈揣編〉與〈摩編〉中的「情」概念.....	50
第二節 《戰國策》強調「情緒」的重要性：以張儀與蘇秦說韓王之言為例.....	55
一、蘇秦之言.....	55
二、張儀之言.....	58
第三節 掌握被勸說者的心：以張儀與司馬錯說服秦惠王之言為例.....	60
第四節 韓非子「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以〈秦武王謂甘茂〉為例.....	66
第五節 結語.....	69
第四章 《戰國策》的修辭技巧.....	71
前言.....	71
第一節 修辭技巧簡述.....	71
第二節 寓言：以四個老虎的故事為例.....	77
一、老虎在論說中的意象.....	77
二、四個老虎的寓言.....	79
1. 狐假虎威.....	79
2. 管莊子刺虎.....	79
3. 虎怒決蹠.....	81
4. 獸不知虎.....	81
第三節 歷史典故、訴諸權威和設問的勸說事例論析.....	83
一、歷史典故與先王的意象與功用.....	83
二、勸說技巧的綜合運用：以蔡澤對應侯的言論為例.....	88
第四節 結語.....	93
第五章 《國語》、《左傳》、《戰國策》修辭觀異同.....	95
前言.....	95
第一節 修辭與道德關係論述.....	95
一、老子、孔子、墨子修辭與道德觀.....	95
二、對策士口才的批評.....	99
第二節 《國語》與《左傳》的修辭觀.....	101
一、《國語》、《左傳》都具有教育的目標.....	101
二、《國語》、《左傳》以歷史人物言行表述道德觀：以「驪姬之亂」為例.....	102
三、言論講德：以晉悼公為例.....	106
四、聖人的評論.....	109

五、語結	111
第三節 《戰國策》以利為主，但不棄道德	112
第四節 《戰國策》具有策士的價觀與《國語》、《左傳》不同	120
第五節 結語	130
第六章 結論	132
參考書目	136



中文摘要



本論文以西方修辭學理論為參照，分析《戰國策》的遊說技巧。歷來已有不少學者對《戰國策》進行研究，其主要論述側重在：辯論之辭的賞析、對策士能力的重視及討論《戰國策》的道德觀念等。相對的，深入分析《戰國策》所載言論之概念系統方面，則尚有一間：學者所運用的相關術語不多，所依據的修辭理論也較薄弱。因此，筆者嘗試借鑒西方修辭理論，運用其已有的修辭系統，分析、討論《戰國策》中的遊說篇章。

本文第二章先就《戰國策》是否是修辭書進行討論。指出即使劉向編輯《戰國策》的目標可能與修辭無關，但是透過章節的結構，可知重點仍在於勸說。即使有部分章節敘事較多，但是這些章節仍有很詳細的辯論，並且具備許多與修辭學相關的資料。

第三章討論《戰國策》與相關修辭理論，首先由西方修辭學為出發，特別是亞里士多德提出的情緒（ $\pi\acute{\alpha}\theta\omicron\varsigma$ ）修辭概念；同時也加入戰國時期類似的概念：韓非子〈說難〉中的「心」與鬼谷子〈揣編〉、〈摩編〉的「情」。另外，筆者也要提出《戰國策》以情緒作為修辭技巧的例子，指出《戰國策》中某些篇章的作者，重視言論對於被勸說方心理的影響而對其特別加以記載，而勸說者則運用與韓非子〈說難〉中修辭概念相同的遊說策略。

第四章以幾個著名的《戰國策》故事為例，分析《戰國策》的修

辭技巧，筆者將論述寓言、歷史典故、設問、訴諸權威四個修辭技巧的功能。其作用為影響被勸說者的情緒。本章也將提出蔡澤運用與鬼谷子〈揣編〉與〈摩編〉相同策略的歷史典故。



第五章則比較《戰國策》、《國語》和《左傳》的修辭目標，指出《國語》與《左傳》之言論主要作為道德教訓，《戰國策》則依靠言論遊說，獲得實際的成功。同時也將討論，學者認為《左》、《國》乃尚義而捨利，《戰國策》則求利而棄義，筆者將透過前述之分析，說明《戰國策》求利固然為真，但並不能說完全捨棄道義，而乃具有屬於其時代的、以百姓為重的道德觀趨向。

關鍵字：修辭學、戰國策、情緒、修辭理論

英文摘要



The purpose of this master thesis is analyzing the rhetorical techniques of *Zhan Guo Ce* 戰國策. Although there are few studies about the rhetoric in this work, all these lack a suitable terminology system for the analysis of his speeches. For this reason, I will use a terminology system whose origin is the Greco-Roman rhetoric.

In the second chapter I will analyze the rhetorical *Zhan Guo Ce* value. Although the intention of the editor, Liu Xiang 劉向, had no connection with the rhetoric, but the main focus of the chapters is the persuasive act. There are passages whose prose has more relevance than speeches. In these passages there are sophisticated persuasive acts and rhetoric closely related information.

The third chapter will present the rhetorical theory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ir use in *Zhan Guo Ce*. Han Feizi and Gui Gu Zi developed a concept identical to Aristotelian *pathos*. In the *Zhan Guo Ce* speeches there are also *páthos* strategies that correspond to what Han Feizi and Gui Gu Zi said. The narrator pays attention to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 they cause.

In the fourth chapter I will analyze four rhetorical figures that frequently appear in *Zhan Guo C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athos*. These rhetorical figures are the fable, the historical example, the rhetorical question and the argument *ad verecundiam*. This chapter will

also see historical examples similar with the strategies that Gui Gu Zi expose in *Mo Bian* and *Bian Chuai* .

In the fifth chapter I will compare the rhetorical *Zhan Guo Ce* objective with *Guo Yu* 國語 *Zuo Zhuan* 左傳. The discourses of *Guo Yu* and *Zuo Zhuan* are the ethical teaching service while The discourses of *Zhan Guo Ce* are examples of persuasion success.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the *Guo Yu* and *Zuo Zhuan* emphasize ethics while *Zhan Guo Ce* is only interested in benefit . This chapter will argue that , although it is true that *shi* 士 seek benefits , but should not be ignored that *Zhan Guo Ce* has his own ethical values.

Key words: Rhetoric, *Zhan Guo Ce*, pathos, rhetoric theory.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修辭義界

一、中華修辭觀

「修辭」一詞的定義並不很具體，而有很廣的義界。¹整體而言，現代各種學科受到西方很大的影響，而現代中華的修辭概念，則基本是從西方通過日本引介而來。²中國古代雖然有「修辭」此一辭彙，但未必和現在的定義一樣。「修辭」最初出現於《周易·乾·文言》：「修辭立其誠」，即使這個詞指修辭學所論述的對象，但並非一學科，其作用係提供「調整語言」的手段來有效地表達意思。

陳望道先生說修辭原本是「勒托列克」的對譯語。³此一西方的系統，自五四運動以來，傳入中國。⁴而在春秋戰國時期，「修辭」一詞還是很罕見的，直到元朝才比較常見，當時的王構寫了《修辭鑒衡》。⁵另外，

¹陳望道先生認為一般人給修辭兩個不同的意思：「其一、修飾文字或者調整或者適用文辭，其二、調整或者適用語詞或者修飾語辭。」（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14。

²鄭子瑜：《中國修辭學的變遷》（臺北：書林出版社，1996年）。

³西方的修辭學最早是 *ῥητορικὴ*。羅馬人翻成拉丁文為 *rhethorica*。現代歐洲的修辭學一詞來自拉丁文。如 *retórica*（西文）、*rhethorik*（德文）或者 *rhethoriqué*（法文）。陳望道先生以英文的詞（*rhethoric*）為「勒托列克」的來源。筆者認為此說法有問題，理由有二：一、西方的修辭學來自古希臘文。二、「勒托列克」聽起來更像古希臘文的 *ῥητορικὴ*。

⁴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頁14。

⁵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頁14。

Kirkpatrick 先生認為中國第一本有立的《文則》。⁶

陳望道先生認為「修辭」一詞有兩種習慣的用法：狹義指「修飾文辭」；廣義則指「調整或適用語辭」。⁷陳望道又認為另有兩種修辭：「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前者的特點是：一、「沒有閒事雜物來亂義」；二、「沒有奇言怪語來分心」，其主要的目的是明白，從內容的角度而言，明確和通順。從形式的角度而言，要用平勻和穩密。⁸而後者，即所謂「積極修辭」，則要使人感動；感動對方需要「利用中介上一切所有的感性，如語言的聲音，語言的形體等等，同時又使語言的意義帶有寫說者的體驗性具體性」。「積極修辭」的手段有兩種：內容和形式，前者指那些「基於經驗的融合」的說段，並且「以情況的適應為主要條項」；就形式而言，指「語感的利用」，就是說那些用來感動對方的手段。⁹黃慶萱也提出修辭的分別，認為修辭方式有兩組：一、屬於表意方法的調整（如設問、引用、婉曲、等等，二、屬於優美形式的設計（如對偶、排比、回文、倒裝等），另外也提出修辭與心理學的密切關係。¹⁰

修辭學和其他科學很接近，特別是語言學。宗守雲討論修辭與其他科學的關係，論述修辭和語言學的關係，二者不同之處在於：一、研究

⁶Kirkpatrick, Andy :“China’s First Systematic Account of Rhetoric: An introduction to Chen Kui's Wen Ze” Rhetorica, Berkeley, 23, no 2,2005,頁 103-153。

⁷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頁 1 - 2。

⁸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頁 49 - 50。

⁹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頁 66 - 67。

¹⁰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局，1992 年），頁 18。

對象不同，修辭學對象係修辭格、得本性、同義手段，而語言學則針對詞語、語言行為等現象。二、內容不同，修辭研究表達，並不研究理解，而語言學則包含研究表達以及研究理解。三、研究傳統不同，修辭是傳統學科，而語言學是一門新興學科。¹¹

本文應用之修辭觀，基本上符合陳望道等現代學者提出的修辭觀，筆者研究的對象包含語言調整。另外，筆者的修辭觀念，也有與語言學接近之處，即認為人類語言有所謂「修辭性」。所謂「修辭性」是西班牙修辭家 Antonio López Eire 先生所提出的，認為一般語言中修辭很豐富。¹²修辭不一定屬於文學，比喻最豐富的也不一定是詩，菜市場也引用它，如蒜頭、太白粉、龍眼、佛頭果或者釋迦。即使修辭與語言學關係很接近，但是還是獨立的學科，其研究的對象為勸說，要論述勸說的理論。

戰國時代，即使修辭尚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但並不代表當時沒有修辭觀念。¹³當時策士游走天下，尋找接受其主張的國君。如果國君認為策士主張有道理，策士便能得到很多的財物，也能獲得很高的地位，更能實踐其學說，因此演說技術的發展很大。

關於戰國時代修辭學可參考兩書：呂行女士的 *Rhetoric in Ancient*

¹¹宗守雲：《修辭學的多視角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5 年），頁 23-28。

¹²Antonio López Eire, *La Naturaleza Retórica Del Lenguaje* (Salamanca:Logo) 2005.

¹³此說可見於 Lu Xing, *Rhetoric in Ancient China, fifth to third century B.C.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8)；陳光磊、王俊橫：〈先秦修辭思想〉，《中國修辭學通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4。

China 和陳光磊、王俊橫先生的《中國修辭學通史》。呂行女士的重點在於儒、墨、名、道、法五家的修辭觀念。她認戰國時期沒有與西方修辭學相等的學科，但是有相關的概念，此概念為「言」、「說」、「辯」、「諫」、「辭」、「實」和「名」。此書分析戰國時代此七字的意義，特別是在儒、墨、名、道、法五家的文獻。

陳光磊、王俊橫在《中國修辭學通史》的〈先秦修辭思想〉一章，也提出比較完全的戰國時期修辭觀，主要討論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縱橫六家的修辭觀念。如「非言不言」和「正名」之說，¹⁴老子的「正言若反」、¹⁵韓非子的「知所說之心」，¹⁶或者鬼谷子的「揣情飾言」。¹⁷不過對《戰國策》的討論，則不是很詳細。¹⁸

另外，過常寶先生《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體及話語方式的生成》一書中，雖重點放在散文，但是也討論不少與戰國時代修辭學相關的方面，如墨子的論辯理論、《國語》的「語」觀以及《戰國策》作為策士

¹⁴就是說君子說話必合禮，並且不該說不符其實之名。陳光磊和王俊橫認為由此可知孔子修辭的重要觀念：一、「修辭的社會功能在於為政安民」二、「名正言順」修辭重要。三、運用修辭一定要符合「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的態度。（陳光磊、王俊橫：〈先秦修辭思想〉，《中國修辭學通史》，頁 33-34）

¹⁵陳光磊、王俊橫：《中國修辭學通史》，頁 93-97。就是說符合道的道理是那些運用違反常理之言。

¹⁶韓非子認為成功說服對方最重要是懂其心理。第三章將詳細討論之。見陳光磊、王俊橫：〈先秦修辭思想〉，《中國修辭學通史》，頁 117 - 120。

¹⁷鬼谷子觀念與韓非子很像，認為言者必須研究對方的心理情況。此問題也將於第三章討論。陳光磊、王俊橫：〈先秦修辭思想〉，《中國修辭學通史》，頁 134 - 138。

¹⁸陳光磊、王俊橫：〈先秦修辭思想〉，《中國修辭學通史》，頁 158。

資料之書。此書對關於《戰國策》的論點將在第二節詳細討論。¹⁹



二、古希臘修辭觀

就西方而言，在雅典修辭學發展的最點階段，其實也沒有一個完成的理論。最早的修辭理論是亞里士多德創造的，在此之前，修辭教法是實用性的，老師教導學生如何說服對方，其方法是讓他們背誦前人的演講。如此，在雅典人開會的時候，學生便可依循前人演講的風格，發出有說服力的意見。所以在西方歷史當中，修辭學一開始是實用性的知識，而沒有理論，理論是後來才誕生的。

雅典有民主體制，每個男公民可以在議會發表自己的政治觀。在這個情況下，口才是政治成功的關鍵，因此雅典人要求修辭課。西元前五、四世紀時，雅典有很多修辭學老師專門教授學生。因為修辭需求很高，所以此學科有很大發展；也開始有雅典人研究如何說服對方的原則，西方修辭理論乃自此而來。

另外值得注意的特點是，在最早的西方修辭歷史階段（希臘和羅馬），口才很好的人，除了西塞羅之外，都沒寫修辭理論的書；反之，擅長修辭學理論者，則不一定是會說話的人。所以，學修辭最好的方法不一定是念很多修辭理論。用此筆者將提出這個問題：戰國修辭教法，是否與古典雅典有著相同的問題與目的？春秋戰國較多書具有歷史人物的言論，這些書是《國語》、《左傳》以及《戰國策》。最後一本從修辭角

¹⁹ 過常寶：《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體及話語方式的生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度來看更是特別豐富，裡面具有很多策士的言論。筆者將於第二章論述其問題。

其次，亞里士多德認為遊說成功最重要是打動對方的心。雅典的演講者完全懂得此道理，用使聽眾很激動的論點，說服超過五千人且不懂政事的雅典公民。戰國時期的韓非子和鬼谷子提出修辭概念，強調懂對方心理情況的重要性。此點將於第三和第四章討論。

另外，自古至今，西方哲學對修辭學表示懷疑，認為是沒有道德的技術，被當作是教詐騙不求真的學科。戰國策士的言說技術，被思想家視為求利棄義的任務，以其口才迷惑王侯，害別人。荀子將蘇秦和張儀之類的臣子當作道德品質最低的，認為其修辭藝術帶來詐騙。筆者將透過《戰國策》和《國語》、《左傳》的比較討論此問題。

總之，戰國時期與古代希臘修辭有三個共通點：一、是適合修辭發展的時代，因為那些有口才的人可以獲利得名；二、二者的修辭理論都強調打動對方之心的重要性；三、修辭與道德發生衝突。因此，筆者認為古希臘的修辭概念適合引用來研究《戰國策》。

第二節 前人研究述略

就筆者所見，研究《戰國策》修辭的學者，主要討論六個重點：第一個是修辭技巧和策略，幾乎每個學者都討論此一議題，其中最常提及的技巧是比喻、寓言、排比和誇張。如施淑儀《戰國策比喻修辭藝術》中論述《戰國策》的比喻，設立八種類的主要比喻：詳喻、倒喻、博喻、合喻、轉喻，引喻、對喻和反喻。比喻的作用是，理解抽象的道理，這樣

使對象更清楚把握它而說服他。用比喻和寓言來打動對象之心。²⁰又如美國學者 Metcalf 先生分析張儀與蘇秦的辯論常用的修辭策略，認為蘇秦運用的修辭策略是「權威境況」(power situation)，也用歷史的例子，以及俗語；至於張儀，往往利用秦國的權威逼近對方，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是秦國的使者，此外他也經常引用歷史事證。²¹

第二點則是評論《戰國策》的道德，學者往往認為縱橫家有功利主義，重利棄義。例如胡如虹《戰國策研究》梳理後代對張儀和蘇秦的批評，指出古人從儒家的角度判斷《戰國策》的策士，批評的重點在於不符合儒家的仁義道德；胡如虹先生則不贊同古人的說法，認為此種批評忽略了戰國時代發生的歷史變遷；不過，其仍存有《戰國策》策士放棄道德的想法，認為策士重「利害得失」。²²

郭丹先生也認為《戰國策》有「重利輕義」的思想，說策士以功利為主，否定禮儀，輕視傳統的價值觀。當時大商人和策士原來是「血肉相連」的。因此有很厚的「商人意識」。他提出一些例子，例如張儀所言「爭名者於朝、爭利於市」，或者范雎的說法「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復歸耳。」²³

²⁰ 施淑儀：《戰國策比喻修辭藝術深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蔡宗陽教授指導，2010 年。

²¹ Mark Leslie Metcalf, Warring states political rhetoric and the Zhanguo ce persuasions, Ann Arbor,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 [Publisher], 2003.

²² 胡如虹：《戰國策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131 - 138。

²³ 郭丹：《左傳國策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69 - 175。

王璇先生則認為《戰國策》的策士求三種利：一、私利；二、國之利；三、民眾和天下之利。也說策士求私利，追求互利。因此認為《戰國策》具有「義」和「利」的統一。二者有衝突時策士以利為先，而捨棄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策士為某一君主遊說他國時，為任用他的王侯得利而害別的國家。另外，也說策士將儒家民本思想加以「功利」的價值觀。

24

第三點則是討論策士的地位與特質，學者指出因為歷史背景，所以策士的能力被君主重視。學者說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言論最自由的時期，諸侯需要好的策略，重賞有好意見的人，提供策士施展其才能的境況，在諸侯常常紛爭下，外交成為重要關鍵，好的使者能夠瓦解敵人或者獲取好盟友。

郭丹先生根據戰國時期的文件，說策士是君主非重視不可的人。他們在戰國混亂的舞台上，把握機會，變成關係國家存亡的重要人物。他分析顏觸的故事，作為重視策士思想的代表，認為顏觸用歷史的角度表示「士」的重要性，也認為《戰國策》「反映了民主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有其重要的社會意義」。²⁵

熊憲光先生也討論《戰國策》的「尚賢」思想。歸納縱橫家思想的特點是「以策略為中心，重計、重利、重時相結合。」²⁶另外，戰國時代的

²⁴王璇：《〈戰國策〉遊說文化研究》，（無錫：江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5-28。

²⁵郭丹：《左傳國策研究》，頁162-167。

²⁶熊憲光：《戰國策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 2004年）頁36-37。

舉用賢才打破尊卑等級，故熊氏認為《戰國策》「是戰國時代『士』的地位顯著提高以及民主思想大大發展的產物」。²⁷

馬慧蘭則分出四類策士：「縱橫策士」、「變法策士」、「門客策士」、「高義策士」。第一組奔走天下，其目的是依靠口才過生活，代表人物為蘇秦與張儀。第二組不奔走天下，其目的是在國家舉行變法，代表人是李悝、公孫痤、龐涓、趙奢、廉頗、吳起、白起、申不害、鄒忌、樂毅以及商鞅。「門客策士」是那些因貴族重視其能力而養他的人，代表人是馮諼、孫臏、藺相如、李斯等。《戰國策》常常有作者不提及其名字的客，很多縱橫策士和變法策士也可以當作門客策士。「高義策士」比較像春秋的官，他們有固定不變的想法，其目的不是得利而是宣示自己的道理，代表人是顏觸、頓弱。²⁸

張素卿老師通過儒、墨兩家文章的比較，認為戰國時期有所謂「抗議的修辭類型」(*controtational mode of rhetoric*)，就是「士」對君主指出錯誤。即使在政治方面，君主的權力更高，但是在「義」、「德」的方面，「士」的地位更高。²⁹

第四點則是研究《戰國策》作為策士教學的觀點。過常寶先生在《先秦散文研究》的〈戰國策士文獻〉一章指出《戰國策》是策士學習的資料，

²⁷熊憲光：《戰國策研究》，頁 93 - 98。

²⁸馬慧蘭：《戰國策論辯藝術研究》(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0 年)，頁 68 - 84。

²⁹Chang Su-ching, "Three Rhetorical Modes in Pre-Qin Court Remonstrance", *Addressing The Autocrat: The Drama of the Early Chinese Court Discourse*, March 21, 2009.

不是子書，也不是史書。不少的學者認為《戰國策》講的史事是真的，過常寶先生則認為很多張儀和蘇秦的言論，不是真正出於他們的手筆，而是別人利用這兩個傑出策士的名字，使讀者重視其辯論技術。³⁰

關於《戰國策》的成書，胡如虹先生提出三種說法：一、作者為劉向；二、秦末的蒯通；三、遊說的策士或者縱橫家們。胡氏並認為第三說最適合歷史面貌，同時又加以補充：一、戰國時代以遊說著名的老師，他們留下其教學資料，劉向整理這些資料寫成《戰國策》。二、像蘇秦或張儀一樣的著名策士，往往帶著自己的學生，學生們記載其老師的言論和活動，以此學習其遊說技術。三、戰國時代為獲名得利而出現很多遊說的行列，於此境況下，也出現很多假託著名策士的說辭。因此，劉向整理的很多言論有可能包含假託之說。四、劉向整理《戰國策》時，將不同的本子放在一起。這些原始素材所記載的事情和言論，有的是著名策士的學生寫的，有的則是史館記錄，而都可能已經對這些言論進行增刪潤色的工作，因此史官即使不是《戰國策》的直接作者，但是增刪潤色策士的說辭，因此胡如虹認為史官可當作作者的一個部份。³¹

將《戰國策》翻成英文的 J.I. Crump 先生認為《戰國策》是修辭的書，所記載的事實不是完全可信的，即使有的事情是真的，但是有很多是虛構的。並且也說《戰國策》有一個所謂的「遊說傳統」(Persuader's

³⁰過常寶：《先秦散文研究》，頁 400 - 438。

³¹胡如虹：《戰國策研究》，頁 1-13。

tradition)。隨著西方漢學傳統，把縱橫家當作「中國詭辯家」。³²

第五點，則是討論鬼谷子與《戰國策》的關係。許立軒先生於〈《鬼谷子》的「隱真」說服理論在《戰國策》說服的應用〉一文中，論述鬼谷子的「隱真」觀，討論《戰國策》的策士以此觀念勸說對方。許氏以隱匿原則的觀念分析《戰國策》某些事例，如關於〈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在魏王的面前哭說害怕被君王放棄，如此使他被憐惜。龍陽君隱藏真的追求的事情。³³另外，關於本文將分析的〈蔡澤見逐於趙〉和〈齊宣王見顏觸〉，許立軒先生分析蔡澤與顏觸在應侯和齊宣王面前的失禮，認為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影響對方聽言論的心裡境況。此策略叫做心理激將，削弱言說對象的氣勢。³⁴

Metcalf 先生則討論鬼谷子的修辭觀念，描述《鬼谷子》中每章所提出的修辭教訓，例如所謂「捭闔」、³⁵「反應」、³⁶「抵巇」、³⁷「內撻」，

³²Crumpp, J.I., *Legends of the warring states : persuasions, romances, and stories from Chan-kuo tse*, Ann Arbor :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8 頁 88-109。

³³許立軒：〈《鬼谷子》「隱真」說服理論在《戰國策》說服的應用〉《東方人文誌》頁 41-42。

³⁴許立軒：〈《鬼谷子》「隱真」說服理論在《戰國策》說服的應用〉，頁 50 - 51。

³⁵「捭闔」研究對方的強弱點和意圖。(Mark Leslie Metcalf, *Warring states political rhetoric and the Zhanguo ce persuasions*, 頁 43)

³⁶言者必須以適合的辭令使對方表示其心理。(Mark Leslie Metcalf, *Warring states political rhetoric and the Zhanguo ce persuasions*, 頁 44)

³⁷教言者如何面對與對方發生的矛盾(Mark Leslie Metcalf, *Warring states political rhetoric and the Zhanguo ce persuasions*, 頁 45 - 46)

³⁸或本文第三章所要討論的「揣」和「摩」。他認為鬼谷子修辭觀受到道家「正言若反」的影響，並且說《鬼谷子》的讀者是那些勸說統治者的人，也強調其學說具有心理技巧。Metcalf 雖然很詳細分析《鬼谷子》的修辭觀念且說其影響《戰國策》，但是並沒以《鬼谷子》的修辭觀念分析《戰國策》的言論技巧。³⁹

最後一點則是運用西方修辭概念討論《戰國策》。屬於此範圍的研究者只有 Paul Rikita Goldin 先生，將《戰國策》的言論視為修辭練習，說其歷史內容是虛構的，也認為與羅馬晚年學校的修辭聯繫（Declamationes）相類似。⁴⁰

總之，前人的研究即使注意《戰國策》修辭的不少面向，但是運用的研究系統是可以改善的。他們提供的資訊很豐富，研究的角度也不少，可是還是需要將他們的研究傳入全世界的修辭學歷史。因此，筆者認為《戰國策》修辭研究需要以設立西方修辭基本的古希臘文修辭理論加以分析，使中國、西方修辭理論互相補足，並且使雙方修辭學者有共同論述的對象。

³⁸內鍵，教言者如何與對方有好的關係，參考 Mark Leslie Metcalf, *Warring states political rhetoric and the Zhanguo ce persuasions*, 頁 45)

³⁹ Mark Leslie Metcalf, *Warring states political rhetoric and the Zhanguo ce persuasions*, Ann Arbor, 頁 42。

⁴⁰Goldin, Paul Rakita, "Miching Mallecho: The Zhanguoce and Classical Rhetoric", *Sino-Platonic Papers*, 1993.

第三節 本文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論題

一、研究方法

本論文借重西方傳統概念與術語來分析《戰國策》的修辭。筆者用的修辭概念是強調說服的藝術，換言之，本文將透過西方的修辭學概念，建構一個系統，論述《戰國策》勸說對方的技巧和策略，此分析系統的重點在於有成功說服對方的技術。

《戰國策》以打動對方的心理來進行說服，幾乎是每位學者都會提到的。筆者與前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使用一個有系統的分析方法。提供此分析系統者係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他設立的修辭觀念，成為後代的修辭學家的基本術語。

美國學者 Kennedy 先生於 *Comparative Rhetoric* 一書中，⁴¹意圖寫全球修辭的歷史，認為除了古希臘的修辭學傳統以外，並沒有其他發達的觀念系統，因此利用古希臘的修辭術語分析其他傳統。當然，此一研究方法引發不少學者的不滿而很熱烈地批評。⁴²筆者不是完全贊同此方法，認為其他的傳統當然具有非常有價值的修辭觀念，例如本文中將討論的《鬼谷子》〈揣篇〉和〈摩篇〉中的「情」以及《韓非子·說難》中的「心」。不過，就戰國時代而言，筆者則與 Kennedy 先生所見略同，即此一時期

⁴¹Kennedy, George Alexander : *Comparative rhetoric: An Historical and Cross-Cultur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7.

⁴²Carol S. Lipson, Roberta A. Binkley , *Ancient non-Greek rhetorics* , West Lafayette, Ind. : Parlor Press, 2009.

確實沒有一個歸納所有修辭概念和術語的「系統」。因此，筆者認為亞里士多德修辭學仍然適合用作研究的出發點與參考點，主要作用是提出此問題：戰國時代是否有與亞里士多德相同的概念和術語？如果有，是否提出亞里士多德沒有注意到的方面？

二、本文討論的問題

本論文將討論四個議題：其一是《戰國策》的修辭性質，討論《戰國策》是否可以當作一本修辭資料的書；其二、論述亞里士多德《修辭學》中的「情緒」觀，是否與《鬼谷子》〈摩編〉和〈揣編〉中的「情」以及《韓非子·說難》中的「心」觀類似，並且論述《戰國策》如何運用「情緒」說服對方；其三、較多學者討論《戰國策》修辭的技巧，筆者將此問題自兩個新的角度加以分析，首先是討論三個屬於西方修辭學的技巧（反問、歷史例子及訴諸權威），其次則是論述策士如何用技巧打動對方的心。其四、道德與修辭的關係，討論《戰國策》與《國語》、《左傳》的異同。

第一點討論的焦點是《戰國策》的修辭性質。《戰國策》經常被視為歷史書；另外，中國古代沒有現代人的修辭觀念，因此筆者將思考《戰國策》是否可以當作修辭的作品，也將討論其中的言論對修辭學是否有貢獻。

就第二焦點而言，即使古代希臘和戰國時期是兩個沒有必然關係的文明，但是修辭的領域有一些共同處：第一、二者均是比較開放的時代，並且百姓可以提出其關於政治的想法；第二、有口才的人比較容易

獲財得位，說服力是其在政治和社會成功的關鍵；第三、辯論修辭理論者認為勸說成功最重要的是懂對方的心理。因此，筆者要借用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概念來分析《戰國策》⁴³。即使此作品與《戰國策》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可以提供適合修辭分析的理論系統。另外亞里士多德修辭理論其中的一個重點，戰國諸子也有，就是觀察對方的「情緒」($\pi \alpha \theta \rho \omicron \varsigma$)。亞里士多德認為「情緒」是說服時最有影響力的因素。筆者將討論、《鬼谷子》以及《韓非子》類似「情緒」的概念，也將討論《戰國策》的策士如何以「情緒」說服對方。

第三個焦點，從「情緒」理論的角度，論述《戰國策》寓言、歷史例子、反問、訴諸權威四個技巧。關於「寓言」，前代學者的討論很多，但尚有一間，即未詳細討論寓言和「情緒」的關係。筆者將透過四個老虎的寓言，分析老虎的「情緒」功能。後三者則是西方修辭很常見的策略，筆者也將討論其「情緒」功能。

至於第四個焦點，筆者以《國語》和《左傳》作為比較、參照，討論《戰國策》道德與修辭的問題。《戰國策》往往被視為重利棄義之書，其中言論也被認為不符合「道德」。筆者將加以反駁，論述《戰國策》即使追利，但是不棄義，而有自己的價值觀。

三、研究資料

筆者參考兩本《戰國策》的版本：范祥雍、范邦瑾：《戰國策箋證》

⁴³亞里士多德《修辭學》即使是前四世紀的作品，但是其修辭觀是西方修辭學的基礎，並且具有很系統的理論，因此適合用來研究《戰國策》的修辭。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和陽子彥:《戰國策正宗》(北京:華夏,2008)。前者具有《戰國策》原文以及後代註者的註解,後則有文本、作者註釋及譯文。本文以前者為主。



至於《國語》、《左傳》、《鬼谷子》和《韓非子》等書,筆者用的版本是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許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邵增樺:《韓非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1990);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第二章 《戰國策》修辭性質論析



前言

最早的學者通常將《戰國策》視為歷史書，後來有學者開始從非歷史角度看《戰國策》。⁴⁴如過常寶先生認為，《戰國策》並不是歷史書，也不是子書，而是遊說學習的材料。⁴⁵他指出《戰國策》中某些張儀與蘇秦的章節是虛構的，或者是後人寫的，因此其中的事情不一定是史事。

⁴⁶

歐美學者最近開始研究西方以外的修辭傳統，並且對戰國時期特別有興趣，認為當時是修辭資料很豐富的時代。當然，不少學者認為《戰國策》是一種修辭書，討論其論述技術，強調有很好的心理技巧，⁴⁷描述策士傳統，⁴⁸並且提供給讀者論述很豐富的資料。⁴⁹

討論《戰國策》的章節應分兩種：其一，編輯者的目標；其二，

⁴⁴過常寶：《先秦散文研究》，頁 413-416。

⁴⁵過常寶：同上，頁 413-416。

⁴⁶過常寶：同上，頁 413-416。

⁴⁷Goldin先生認為《戰國策》提供學論述的資料，並且認為是和羅馬晚年中學修辭教育資料相同，羅馬人學修辭的方式是，以神話故事為主造言，他們要先辯護某一個人物的行為，然後批評他。（見Goldin, Paul Rakita, “Miching Mallecho: The Zhanguo ce and Classical Rhetoric”, Sino- Platonic Papers).

⁴⁸Crump, J.I. , Legends of the warring states : persuasions, romances, and stories from Chan-kuo ts'e.

⁴⁹Mark Leslie Metcalf, Warring states political rhetoric and the Zhanguo ce persuasions.

原本的作者。



劉向於〈戰國策書錄〉說：

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口。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

（也）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也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戰國策書錄〉，《戰國策箋證》，頁3）

即使此段文字並未提及修辭學，但是也不否定《戰國策》的修辭價值。劉向〈戰國策書錄〉的重點在論其道德品質，認為屬於禮壞樂崩重利輕德的時代。

筆者認為劉向之所以不提及《戰國策》修辭學是因為他沒有此概念，而且其行業是「光祿大夫」而不是在君主面前論國事。因此，他編輯《戰國策》的標準與修辭無關。

至於原本的作者，劉向〈戰國策書錄〉提出很好的資訊：屬於道德品質不高之君重用的策士，他們不會設立永遠不變的思想，而是要把握狀況，依其能力得利獲名。我們現代人無法瞭解《戰國策》各章原本的目的，也不能以偏概全說各章的目標一樣。我們只能做假設。

筆者的假設是，即使《戰國策》的文章結構有多種，但是大部份有很相同的結構，而且其重點在於策士之言。另外，章節重點不在言論，但是提供我們很多與修辭相關的資訊。因此，筆者將討論的是，即使原

本的作者不太可能以修辭學為主書寫，但是因為策士成功最強的工具是口才，所以《戰國策》對修辭歷史是非常有貢獻的書。



第一節 《戰國策》的文章結構

一、一般的結構

《戰國策》大部份章節的結構是這樣的：作者先簡明地敘述國家一件史事，或者君主對策士提出某個關於政事的問題，請問他們的看法，然後，策士給國君意見。有的章節有策士跟國君的對話，有的章節也提出君主的回答或反應。以下舉三個例子。第一個為〈燕策一·趙且伐燕〉：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王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將為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並且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戰國策箋證》，卷三十，頁 1767）

此文開頭解釋情況，就是趙欲攻燕，蘇代見趙惠王阻止。然後有蘇代的言論，蘇代以鷸和蚌的寓言比喻趙燕兩國的互爭，牠們因為在吵架沒注意漁翁在逼近，結果被抓。最後有蘇代言論的結果，就是趙王聽信他。

再如〈楚策一〉：

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

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戰國策箋證》，卷十四，頁 755）

此文解釋楚王的問題，他怕昭奚恤控制北方的國家，所以請左右建議。然後有江一的言論，與楚宣王講不該當心昭奚恤，因為他只是一隻很會騙的狐狸，而楚王是很強的老虎。又如〈秦策四〉：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

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鋤推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戰國策箋證》，卷六，頁 395-396）

此文開頭敘述秦始皇想要見頓弱，頓弱說見秦王不會行「拜」禮，秦王必須接受，否則不會見他。秦王接受，然後有頓弱的言論，罵秦始皇不孝順。最後有此言的結果，就是秦始皇接受頓弱的勸諫，並且得到很好

的結果。



二、提出勸說過程的章節

《戰國策》也有很詳細提及遊說背景，使我們瞭解勸說過程的結構。以下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見〈趙策四〉：

虞卿請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也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執范座而未殺也。

范座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座〕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主（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便）也。」

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左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望〕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

遽言之王而出之。（《戰國策箋證》，卷二十一，頁1203—1204）

透過此章可知范座如何阻止虞卿的讒言，而說服魏王不殺他。此章有三

節：第一節自「虞卿請趙王曰」至「而未殺也」；第二節自「范座獻書魏王曰」至「不若以生人市使也」；第三節自「又遭其後相信陵君書曰」至「遽言之王而出之」。



第一小節虞卿勸說魏王殺范座，使我們瞭解范座獻書給魏王和信陵君的背景。第二節是范座獻給魏王的信。第三節則為獻給信陵君的信，也有提及范座以「書」勸說他的成功。

第二個勸說之例見〈韓策一〉：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

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為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為雁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弊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弊邑將以楚殉韓！」

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苦）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

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朋）也。（〈戰國策·韓策一〉《戰國策箋證》，卷二十六，頁 1513—1514）

此章可分四節：一、自「秦、韓戰於濁澤」至「將西講於秦」；二、自「楚王聞之」至「韓王大說，乃止公仲」；三、自「公仲曰」至「韓氏大敗」；四、自「韓氏之兵」至「失計於韓明（朋）也」。

第一節公仲明建議韓王與楚國斷盟，與秦國講和，加入連橫攻楚。韓王同意而派他出使秦國。第二節楚王聽此消息而恐懼，召陳軫謀畫對策。陳軫建議他公開表明將出兵救韓，如此韓王一定不會想攻楚。楚王聽其建議，派使臣向韓王表明楚國要幫助他。第三節韓王聽到楚國來救援，自然很高興，並且阻止公仲去秦國，公仲則反對並提醒他，楚王以陳軫的陰謀欺騙他，之所以這樣做不是因為真的擔心韓國，而是避免韓與秦一起攻楚。韓王不聽，結果秦大怒打敗韓國。第四節，作者做了此章的評論，批評韓王被陳軫欺騙而沒聽公仲，所以大敗。

由此兩章可知君臣辯論國事的過程，也可知《戰國策》記載言論的背景。二者提供一個如何面對受到讒言的境況。像陳軫的策士能夠迷惑君主，不聽其計謀做有害自己的事。



第二節 重點在遊說的篇章

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

蘇秦開始當說客時試圖說服秦王統一天下，其論點是，因為秦國很強，所以應該征服他國，〈秦策一〉：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戰國策箋證》，卷三，頁 141）

但是，秦惠王不同意蘇秦的想法，認為秦國與不會高飛的鳥一樣，並非很強，因此不能夠統一天下，秦惠王說：

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同上）

蘇秦又試圖說服秦惠王說不能理解為何不欲統一稱霸。當時天下很亂，

諸侯無德，從前，天下如此，明君一定會伐兵懲無德之國。作為一位明君，秦惠王必須舉兵正亂，稱霸天下。蘇秦說：



臣固疑大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同上，141-142 頁）

蘇秦並沒有勸說成功，《戰國策》這樣敘述他的失敗：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滕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狀有歸色。歸至家，妻不下紵，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歎曰：

「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同上，頁 142）



由此可見，蘇秦不但變得很窮，而且其家人也看不起他。後來蘇秦決定努力學習：

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

晷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同上，頁 142）

然後，去趙國試圖說服趙王。他成功了，並且把合縱國家聯合在一起對抗秦國，因此得到很高的地位以及很多財富，並且得到其家人的尊重：

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綿（錦）繡千純，白壁百雙，黃金萬溢，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溢為用，轉轂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棧樞之士耳，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

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盍可忽乎哉！」（《戰國策箋證》，卷三，頁 142—143）

由此可見，蘇秦說服趙王之後，變成合縱國家的重要人物，合六國，使秦不敢出兵超越函谷關。其家人聽到他成功，在洛陽準備大宴會接待他，之前不理的夫人不敢看他，之前不給他吃飯的嫂子像蛇一樣跪於蘇秦的面前請罪。

由此可知，戰國時代那些有口才的人可以成功。蘇秦因為沒有說服秦惠王，變成窮人，但是說服趙王之後，變成很重要的人物，獲得很多的財富，而且家人重視他。他體會到成功在於能夠說服君主，因此很用功學習《太公兵法》和《鬼谷子》的〈摩編〉和〈揣編〉。

古希臘修辭發展的重要因素，口才乃是成功的關鍵。根據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記載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因他的口才而成為雅典「第一位男子」：

Ἐστὸ τε λόγῳ μὲν δημοκρατία, ἔργῳ δὲ ὑπὸ τοῦ πρώτου ἀνδρὸς ἀρχή:

50

人家說雅典是一個民主的城邦，可是說實話，是由第一位男子統

⁵⁰ Thucydides, *Historiae*, 2.65.

治的⁵¹。



雅典民主體制沒有總統、首相、主席或者類似的職位。那時候，無論是貴族還是農民，富人還是窮人，所有雅典公民都可以在雅典集會提出自己的關於政治的看法。集會結束以後，雅典人舉行投票選擇最好的建議，沒有誰的權力比別人更大。可是，實際上，五世紀的雅典公民把伯裡克利視為最好的，因此修昔底德把伯里克利稱作「第一位男子」。而他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的良好口才。

二、〈鄒忌脩八尺有餘〉

鄒忌擔心自己不如徐公一樣帥，所以問妻，妾以及客人他是否比徐公更帥。他們三個都說鄒忌當然比徐公帥：

鄒忌脩八尺有餘，身體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戰國策箋證》，卷八，頁521）

⁵¹ 由筆者譯成中文。

但是鄒忌並不相信他們，而且自認為徐公確實比自己好看，鄒忌去見齊王，跟他說此問題：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戰國策箋證》，同上，頁 521-522）

鄒忌提醒齊王，沒有宮婦不愛他，沒有臣子不怕他，沒有人臣於君主不求事，因此齊王不對，他們一定不會講。齊威王認為鄒忌說的話有道理，所以下了命。那些當國君的面批評他的錯誤的人得到最高獎，那些寫信給國指出其錯誤的人得到中等之獎，那些在市場提出國君錯誤的人得到下等之獎。開始的時候很多人提出可以修改地方，過了幾個月之後，有修改建議的人越來越少；過了一年，雖然有人，但已沒有什麼新的意見可以提出。

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戰國策箋證》，卷八，頁 521-522）

由此可見，戰國時期君主重視他人的意見。另外也可見貴族百姓都可以提供自己的想法。

修辭發展的一個條件是，被統治者可以對一件事情提供自己的看法。歷史上政治最開放的時代是修辭歷史最發達的階段；反之，那些統治者很少接受別人意見的時代是修辭最不發達的時期。因此，被統治者有權力提出自己的想法，是修辭發展的重要條件。由第二個故事我們可以知道，雖然戰國時期沒有民主體制，但是統治者不但接受貴族以及百姓的意見，而且也獎賞那些指出自己錯誤的人。

第三節 重點在敘述的篇章

以下將討論的章節，重點不在言論，而敘事較多，雖然如此，還是有修辭研究的價值。

一、〈韓傀相韓〉

〈韓策二〉聶政的故事如此記載：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遊，求人可以報韓傀者。

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遊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



行遊諸侯眾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

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

政姊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



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也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也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戰國策·韓策二〉《戰國策箋證》，卷二十七，頁 1575－1577）

此章敘事頗多，重點不在言論。另外，關於主要人物聶政的賢，其姐說「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荊矣」，強調其勇猛。雖然如此，從修辭學的角度來看，嚴遂勸說聶政行刺的辯論方法，即使技術不如蘇秦或張儀，還是有其價值。

首先嚴遂意圖博取聶政的好感，先是很客氣的說話，並且準備酒菜。聶政明白嚴遂想求他做大事，故與他講因為要奉養老母，所以不能接受。嚴遂命令其周圍的人離開，對聶政說明自己有求於他，乃是希望報仇，另外也承諾獻給他很多財富使他不用擔心老母沒有依靠。聶政回答說不會因別人而離開老母，嚴遂懂其意，但仍以很有禮的方式離開。

聶政在母親逝世之後，乃確定接受嚴遂所請，行刺韓王的叔父韓傀。聶政建議獨自去韓國，在行刺成功後自殺，並且依循嚴遂所託，至死不洩漏自己的身分，讓主謀者嚴遂不致受到報復。如此，嚴遂說服聶政報仇韓傀成功。由於二者的關係並非上對下，因此嚴遂不能以其權力要求他，反之，需要以很客氣的方法勸說他。

二、〈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講意圖刺殺秦始皇的荊軻故事，此章敘事較多，與《戰國策》其他文字相當不同，特別是最後的部分。在《戰國策》中幾乎沒有其他章節有如此詳細的敘事；但是，可以說此章與修辭完全無關嗎？是否可以以它反駁《戰國策》是一本修辭書這個說法呢？

荊軻故事很難確定是否有修辭的目的，但可以說此段文字有很多言論。第一是：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大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為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排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戰國策箋證》，卷三十一，頁 1786—1787）

燕太子丹怕燕國因秦國而受大禍，因此問其太傅鞠武意見。鞠武懂得秦國對燕是很大的威脅，但是自己不知道應該做什麼，所以請太子多一點時間思考。第二言論是：

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減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於，然後乃可圖也。」是以(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救)矣！雖有管、晏，不能為謀。願太

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同上，頁 1787）

太傅鞠武諫諍他說，虎狼秦軍功燕，人民就會很害怕，燕必亡。因此建議他將樊將軍送到匈奴。太子不聽，且責罵太傅鞠武。第三則言論是：

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荊軻可使也。」（同上）

太子欲見田光，派太傅鞠武找他。田光與太子說自己已經老了不能實現對抗秦國的計劃，因此建議他找荊軻。第四則言論是：

樓行見荊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荊軻，

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同上》，頁 1788）



田光見荊軻，強調他已老，不如年輕時，因此不能幫助太子，請荊軻幫太子對抗秦國。另外，田光說太子懷疑他，為使太子相信他沒泄密，就自殺了。第五言論是：

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同上，頁 1788—1789）

太子說燕軍不如秦軍強，秦始皇野心勃勃，欲併吞天下。秦國進攻楚、趙，如果趙打敗，燕國就很危險，所以唯一避免滅亡的方法是刺殺秦始皇。秦始皇死秦國無序大亂，其他國家聯合進攻，就可以亡秦，並問荊軻是否可以刺殺秦王。荊軻說自己驚下，怕不能實現太子的計劃。太子安排給荊軻非常繁榮的住宅，給他多一點時間想刺殺秦始皇的方法。第六則言論是：

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受把其袖，而右手撻抗其嚮，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同上，頁 1789—1790）

荊軻找辦法殺秦王，他想要樊將軍之首。如果有人可以送給他樊將軍的

頭，一定可以使他見秦始皇，如此才能夠刺殺他，因為離他很近。太子不接受，說絕對不能利用樊將軍的生命抗秦。



《戰國策》一般章節只有君主提出的問題以及策士的意見，荊軻的故事卻可見燕國太子準備刺秦始皇的全部過程。由此可知，戰國時代君主與其左右如何策劃一個陰謀，也可見策士給國君意見的情況。

最後的部分都是敘事，講荊軻如何試圖刺秦始皇。荊軻的故事最後的部分與《戰國策》其他的章節相當不同。

荊軻與聶政故事有共同處，就是太子丹與荊軻沒有下上的關係，前者沒有權力要求後者刺殺秦始皇，因此需要說服他。於此故事很清楚地可見太子說服荊軻刺殺秦始皇的過程。此外，荊軻策略的焦點是將樊將軍之首交給秦始皇。因為太子不敢這樣做，所以荊軻需要自己說服他自殺，《戰國策》很詳細記載荊軻勸樊將軍自殺的言論。

三、〈齊人有馮諼者〉

〈齊策四〉所載馮諼的故事比較特別，與其他《戰國策》章節共同的地方在於是都教讀者如何對待有權力的人，不同處在前者對話及言論少，敘事多。馮諼為孟嘗君實行狡兔三窟的策略。《戰國策》一般教如何說服有權力的人，馮諼的故事則是教如何為他們做事。唯一等同於《戰國策》一般提出策略言論的是：

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



「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戰國策箋證》，卷十一，頁 621）

此章節也有另外一種修辭。根據羅馬著名修辭理論，言論的造成有五個部分：一是論點的尋找，二是論點的安排，三是論點的辭令，四是背演講稿，五是演講的表演。雅典最有名的演講者德摩斯梯尼認為舉行演講最重要是其表演。表演不好，演講雖有內容、安排，辭令很好，但是會沒有說服力。

舉行演講時，演講者的動作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不適合或者讓聽者不高興的動作結果會很糟糕。一個很適當的動作可以讓一個很普通的演講成功。最近學者發現，溝通 93% 屬於非言語交際，其中 38% 是說話的聲音、發音等等，55% 是說話的動作。⁵²於馮諼的故事可以看到很有說服力的動作：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

⁵²Brian O'C. Leggett, *Persuasión: la clave del éxito en los negocios*, 頁 148-149.



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戰國策箋證》，卷十一，頁 620—621）

馮諼每次「倚柱彈其劍」的報怨動作，讓他獲得更高的地位，為了得到目的而運用語言以及動作。

總之，此章節作者的重點是教讀者如何為君主狡兔三窟，也是給讀者看馮諼謀略的能力，即使修辭不是此故事的重點，但仍然可見馮諼的修辭能力。

第四節 結語

中國古代沒有現代人的修辭觀，也沒有學科很明顯的分別，因此《戰國策》的策士不太可能按照一個有系統的修辭理論造言，劉向也不太可能以現代修辭觀編《戰國策》。

雖然如此，《戰國策》大部分章節的重點在於言論，而不在敘事。而且，那些敘事比較多的言論也提及對修辭很重要的資料。由蘇秦的故事可知，有口才的人，即使原本很貧窮，但是可以變成很有地位和財富的人。由鄒忌的故事可見，被統治者的意見對君主很重要。聶政和荊軻

的章節結構，與其他章節不同，而且主要人物並非策士，而是刺客，即使如此，還是對修辭學有貢獻。嚴遂沒有要求聶政做事的權力，因此需要勸說他，《戰國策》記載嚴遂說服聶政的言論。



至於荊軻的章節，太子丹也不是直接命令荊軻刺殺秦始皇，中間《戰國策》記載不少的言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二者沒有下上的關係

最後，由馮諼的故事可見非言語修辭的好例子，馮諼每次「倚柱彈其劍」抱怨，都能使孟嘗君給他更高的地位。

總之，《戰國策》可以當作策士教學資料，由此章論述的故事可知策士成功的主要工具是口才，因此，即使戰國時代沒有現代的修辭觀念，《戰國策》的修辭卻很豐富。筆者認為，此書對修辭的歷史非常有貢獻。

第三章 亞里士多德《修辭學》中的「情緒」(πάθος) 觀與戰國時期似類概念



前言

亞里士多德《修辭學》理論的焦點是「情緒」觀，意指被勸說一方的心理狀況。本章將討論戰國時期的韓非子和鬼谷子具有與他相似的概念，另外《戰國策》中的策士言論也可見從對方的心理進行勸說的策略。⁵³

本章第一節將解釋亞里士多德《修辭學》中的「情緒」，並論述《韓非子·說難》中的「心」觀與《鬼谷子》〈摩編〉、〈揣編〉中的「情」觀。第二節將分析蘇秦和張儀對韓王的言論，論述二者如何掌握「情緒」而說動韓王的心。第三節將以張儀和司馬錯對秦惠王的言論為例，透過《韓非子·說難》中的「心」觀，論析為何秦惠王最後聽從司馬錯之言。第四節中，將指出「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此一論說方式，討論甘茂以曾子的寓言阻止秦惠王進攻韓的言論。

第一節 亞里士多德、韓非子及鬼谷子的「情緒」概念

⁵³有學者描述《戰國策》的心理技巧，認為策士以動心遊說王侯。如鄒濬智：〈《戰國策》辭令辯論學研究〉：《遠東學報》第 7 頁 345 - 347；黃越：〈蘇秦用活攻心術·齊王還歸燕十城〉《心理世界》，1997 年 1 月；王晶雄、商景龍和管秀從邏輯的角度來看，分析許多《戰國策》章節中的「假言」命題。見王晶雄、商景龍、管秀：《戰國策與論辯術：歷史的啟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一、亞里士多德《修辭學》中的「情緒」概念



亞里士多德《修辭學》提出四種說服方式，包含兩大類型：「非屬於藝術」與「屬於藝術」。「非屬於藝術」的說服方式是證據（πίστις），⁵⁴它們自己本身具有說服力，不依靠演講者的技術。「屬於藝術」的三種方式則是理性論點（λόγος）、⁵⁵「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ἥθος）⁵⁶以及被勸說方的「情緒」（πάθος）。⁵⁷與本章內容密切相關的是「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與「情緒」兩種說服方式。

證據是那些可以證明某一件事情的真相。例如如果要說服法官甲殺乙，可以提供一個證明罪惡的影片。若政治人物要勸說聽眾相信國家的經濟好，最好給他們看表明國家收入很高的統計。如果在野黨要勸說聽眾執政黨治國治得不好，可以給他們失業率很高的統計。

理性論點以邏輯為主。例如如果要說服孩子不要在花蓮的海邊游泳，可以跟他說花蓮海浪很大，在那裡游泳很危險。如果要說服孩子不要在臺北市的羅斯福路亂過馬路，可以跟他說汽車開得很快又很不小心，所以，如果你亂過馬路，一定會被撞。

⁵⁴W.D. Ross, *Aristotelis Ars Rhetorica*, 1355b-1356a.

⁵⁵W.D. Ross, *Aristotelis Ars Rhetorica*, 1355b-1356a.

⁵⁶W.D. Ross, *Aristotelis Ars Rhetorica*, 1355b-1356a 和 1378 a.

⁵⁷W.D. Ross, *Aristotelis Ars Rhetorica*, 1355b-1356a 和 1378 a-1391a.

「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指某一個人本身的說服力。例如關於某一個食物是否可以吃，如果勸說的人是一個常常詐欺、道德品質有問題的人，一般人不會相信他；但若是一位學問豐富、道德品質優良的專門醫生進行勸說，則一般人一定不會懷疑。

「情緒」指根據對方的心理狀況說服他，例如在野黨政治人物欲勸說公民投票給他，可以說很多讓他們討厭執政黨的話，比如說執政黨不理民意、貪污不斷、看不起百姓、官商勾結等等。另外，也可以讓人民害怕執政黨繼續執政，如執政黨會滅毀國家的福利及人民的權利，會把國家賣給敵國，會讓間諜偷窺一般人的電腦資訊等等。

亞里士多德認為「情緒」是對被勸說方最有影響力的說服方式。他提出「情緒」的重要性如下：

Ἔστι δὲ τὰ πάθη δι' ὅσα μεταβάλλοντες διαφέρουσι πρὸς τὰς κρίσεις οἷς ἔπεται λύπη καὶ ἡδονή, οἷον ὀργῇ ἔλεος φόβος καὶ ὄσα ἄλλα τοιαῦτα, καὶ τὰ τούτοις ἐναντία.⁵⁸

人類的想法之所以能夠被改變，是因為情緒。屬於痛苦和愉快的感覺都跟隨情緒，例如憐憫、恐懼以及類似和相反的感覺。⁵⁹

雅典的演講者以被勸說者的「情緒」為主，以法院演講為例，被告者常常會運用能夠打動對方的心的論說法，以此避免獲罪，例如讓自己的家

⁵⁸W.D. Ross, *Aristotelis Ars Rhetorica*, 1378a.

⁵⁹此段原文由筆者翻譯。

人去法院，在法官面前哭泣，讓他們對被告家人感到憐憫而免罪被告者。著名演講者德摩斯梯尼在修辭最強的方面，是能夠打動聽眾之心而勸服他們。當時雅典受到北方腓力王（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的威脅，德摩斯梯尼說服雅典人抗抵他，其演講的焦點就在「情緒」，讓他們痛恨腓力，怕他稱霸希臘，憫恤因他而受難者，給他們打敗腓力很大的希望。

亞里士多德的修辭說服方式，不限於古典雅典，也可以用來分析別的時代的演講。如反對北韓擁有核彈武器，如果用理性，可以說，由於金正恩花很多錢在核彈武器，所以百姓過生活很辛苦；也可以說，因為北韓是極權政體，所以有核彈武器這件事對世界和平是很大的威脅。

就「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此一方法而言，反對北韓的人必須懂得此國的境況，有民主主義以及和平主義的想法，不會以戰爭獲得自己的利益，也要提出美國及南韓的一些錯誤，以免聽者覺得有不中立的想法。

至於「情緒」，主要的目標是懂對方的心，如可以說北韓是很可怕的極權政體，領導人是狂人，政府常常用酷刑虐待百姓，北韓人無法上網，不瞭解國外，政府常常洗腦民眾，法律很殘酷地懲罰犯罪人的家人，北韓是世界最不開放的國家，領導人以百姓的努力過很奢華的生活，外國人不能自由在韓國旅行，北韓與德國集中營一樣，或者金正恩與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提出的老大哥（Big Brother）一樣。

上述言論的方式可以「證據」加強，例如集中營的照片，在北韓受苦的人民的影片等等。根據亞里士多德所指出，「情緒」是對方最有

影響的說服方式，他提出十三種「情緒」：憤怒、平靜、情愛、痛恨、恐懼、安全感、恥辱、無恥、感謝感、憐憫、氣憤、嫉妒以及羨慕。



二、韓非子〈說難〉中的「心」概念

《韓非子·說難》解釋辯士的困難說：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韓非子今註今譯》，頁 281－282）

由此可見，韓非子認為「說」最困難的是懂得「所說之心」。文中「說」指各種言論，而「所說之心」意為對方的心理狀況。⁶⁰

〈說難〉中有一個特別需要討論的觀念，「所說」，指被勸說者。研究修辭藝術包含說者和聽者，也有寫者和讀者，二十世紀著名學者 Chain Perelman 提出此「聽眾」觀念，勸說者必須適應聽眾來進行演講，否則不太可能會成功。⁶¹

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討論「情緒」，教讀者如何操作被勸說方的心，也針對被勸說方的個性進行分析，研究什麼事情讓對方不高興，會痛恨那一種人。另外，也分析不同年齡的心理。亞里士多德認為年輕人最容易接受新的想法，因為生活經驗單純；相反的，老年人不太會相信新的

⁶⁰陳光磊先生論述〈說難〉的修辭觀，認為韓非子和亞里士多德都重視「對方的情感心理」（見：陳光磊：《中國修辭學通史》，頁 117 - 118）。

⁶¹Perelman, Ch, Tratado de la Argumentación, 頁 55。

想法，因為被騙許多次。最理想年齡是成熟年齡，因為不會很單純，也不會很容易不相信。⁶²



筆者認為《韓非子》「知所說之心」的觀念，與亞里士多德的「情緒」觀念是相當類似的：都二者都一方面指對方的心理狀況，另外一方面也是說服成功的關鍵。《韓非子·說難》還有不少與亞里士多德「情緒」觀相關的說法：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同上，頁 282）

於此可見，韓非子分析被勸說者的內心和表現。有人欲得利，有人則欲獲名。有時即使表面上想要權利，其實是欲名；有時表面上要名，但是內心卻欲利。另外，《韓非子》也提供如何順從對方心理的策略。第一為：

「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韓非子今註今譯》，頁 285）

意為懂得被勸說者自己感到驕傲的事情，而要掩飾那些使他覺得羞愧的事情。第二為：

⁶²W.D. Ross, *Aristotelis Ars Rhetorica*, 1388b-1390a.

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同上，頁 285)



意為被勸說者的目的其實出於私意的時候，說話者必須強調提供的意見對大眾有利，以修飾之。第三為：

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己，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同上，頁 285)

意為被勸說者想要做一個實際上無法做的事情，勸說者則要提出其不對的地方，並且用贊美阻止他。當被勸說者心裡覺得有卑鄙的事情，但還是非做不可，此時勸說者要以美言強調其好處而輕視其壞處⁶³。

第四為：

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同上，頁 285)

意為被勸說方對自己的智慧相當自負的時候，勸說者要使對方以為提供意見是出於自己的，讓他覺得可以用自己的智慧解決問題。第五為：

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

(同上，頁 285)

⁶³ 「多」有「贊美」之意。《韓非子》注者謝希深注：「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為，則示以公義而勵強之。彼雖下意從己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為之飾其背私之義，而以不能公為少，有激彼存公也。」(見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頁 239)

意為勸說者如果想向對方進獻言論所提出是和敵人共存，必須強調此做法一定帶來美名，並且暗示這樣做符合自己的利益。另外，要陳述有危險的事情時，就要表明這樣一定引起毀謗，並且暗示這樣對自己有害。

⁶⁴第六為：

「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污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同上，頁 285）

意為要稱讚行為和勸說者一樣或者指正和勸說者不同的策略的時候，如果他的錯誤和勸說者一樣，就要以美言說他無害，如果他有和勸說者類似的失敗，就要以美言說損失並不大。第七為：

「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同上，頁 285）

意為被說者自己認為很強壯，那就不應該提出做不到的事情表明其能力很一般，因為他認為很果敢地決斷自己遇到的事情，所以不應該提出其錯誤激怒他。

另外，在亞里士多的《修辭學》理論中，「情緒」和「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是兩個互補的概念：「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會影響對方的心理，例如反對北韓的時候，如果十歲很單純的女孩說自己和其家人通過的困難，聽眾會憐憫她，因而討厭北韓的政府和領導人。但是，

⁶⁴「內」有「進獻」之意。「相存」表示「化敵為友，使之共存」。「微見」表示「暗示」。韓非子注者謝希深注：「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為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見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頁 239

一位有帝國主義、種族主義，而且平常說謊的美國記者，如果說同樣的話，聽眾一定會討厭他，而且將北韓當作美國帝國主義的受害者。韓非子懂得「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的重要性，所以於〈說難〉提出一些相關的說法：

昔者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同上，頁 288—289）

《韓非子》以兩個故事說明「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的重要性。第一個故事中，鄭武公想進攻胡，因此將其女嫁給胡君；然後故意問群臣「誰可伐」，大夫建議他攻胡國時，鄭武公卻大怒而殺死他，以此博得胡君完全的信任，再把握機會突然攻打胡國。第二個故事是宋國有一位富翁，家裡的牆因下雨而倒掉，兒子和鄰居都提醒他強盜要把其財富拿走，隔一天財富不見，富翁認為兒子很聰明而懷疑鄰居。

由此可見，韓非子有和亞里士多德「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類似的觀念，認為被勸說者對於勸說者的印象。也是進行說服時的重點。

韓非子的意思是，某一句話由不同的人來說，有不同的結果，以宋國富人為例，鄰居、兒子皆提醒他盜賊要來，即使二者說同樣的話，富翁之家卻認為其兒子很聰明，而懷疑鄰居。



進一步而言，筆者認為《韓非子·說難》中類似「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的觀念中，尚有亞里士多德沒有提到的方面，即勸說者論說時的境況、時機的影響。以鄭武公的故事為例，大夫即使想法和鄭武公一樣，但是因為此時鄭武公欲欺騙胡君所以殺大夫。如果大夫是在別的時刻說出同樣的話，鄭武公一定會接受。因此可說，對韓非子來說「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除了勸說者本身之外，他還要考慮論說發生時的情況。

三、鬼谷子〈揣編〉與〈摩編〉中的「情」概念

傳說鬼谷子是縱橫家的鼻祖，也是卓越策士張儀及蘇秦的共同老師。⁶⁵《鬼谷子》書，學者頗有懷疑出於偽作。雖然有此疑慮，但由《戰國策》的載錄中，我們仍可以瞭解《鬼谷子》〈揣編〉及〈摩編〉是戰國時代的書。根據《戰國策》記載蘇秦遊說秦惠王以後：

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戰國策箋證》，卷三，頁142）

⁶⁵據司馬遷之說：「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又說：「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史記·蘇秦列傳》，頁2241）

此文敘述蘇秦如何提高其智慧。他晚上專心學習《太公陰符》，⁶⁶並且練習「揣摩」。「揣」、「摩」兩字指〈揣摩〉及〈摩編〉。⁶⁷由此可知：一、二書不是後代的偽造；二、其內容是實用的，《戰國策》的作者說蘇秦「簡練以為揣摩」；三、讀〈揣摩〉及〈摩編〉的目標是想說服當時的君主，即蘇秦所謂「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司馬遷的《蘇秦列傳》也可以證明〈揣摩〉及〈摩編〉二書是戰國時代策士訓練的資料：

蘇秦……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列傳第九蘇秦〉，《史記會注考證》卷 69，頁 874）⁶⁸

〈揣摩〉及〈摩編〉中都有「揣情」觀，其概念如下：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鬼谷子集校集注》，卷七，頁 102）

「情」指對方的心理狀況，類似今日所說的「情緒」。鬼谷子強調要善於觀察王侯之權力及其心理狀況（「情」）。之所以要知其「情」是為了

⁶⁶《戰國策》的註者吳師道云：「《陰符經》恐非此所指。《索隱》云：『《陰符》是太公兵法。』」由此可知，《太公陰符》指《太公兵法》（見：范祥雍，范邦瑾：《戰國策箋證》，頁 159）

⁶⁷根據《正義》：「鬼谷子有〈揣〉及〈摩〉二篇，言揣諸侯之情，以其所欲切摩為揣之術也。」由此可知「揣」、「摩」指鬼谷子的〈揣摩〉和〈摩編〉（見：范祥雍，范邦瑾：《戰國策箋證》，頁 159）

⁶⁸ 瀧川資：《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02 年。

瞭解被勸說方心裡隱藏的情緒。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出其變。(同上，頁 104)

鬼谷子指出被勸說方通常會隱藏自己的心理狀況，不使勸說者知道。瞭解其「情」可以使他很高興，如此不會控制自己而使其情緒出現，也可以提出使他害怕的事情，如此使其情緒不再隱藏。

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出其變。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其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探）{揣}情。(同上，頁 104)

意為勸說者如果懂得被勸說者的心理狀況，被勸說者的情緒就會於其外貌顯現，這就是所謂的「揣情」。又說：

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可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同上，頁 106－107)

意謂，說服對方一定要察其情緒，觀察其所重視的，輕視的，使他受害的，使他得利的，使他成功的，使他失敗的。只有「揣情」，才能使對方無所隱匿。

由上述可知，勸說者即使懂得先王之道或者具有最聰明的策略，如果不能猜測對方的心理（「揣情」），就無法成功。若言論適合其情緒，則被聽取。這是造言的基本原則。



「情」指對方的心理情況，鬼谷子將懂對方之「情」當做說服的焦點。〈摩篇〉提出「摩」和「揣」兩字，二者是與「情」相關的概念：

摩者，揣之術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摩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所應也，必有為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竅，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應在彼，從而用之，事無不可。（《鬼谷子集校集注》，卷八，頁 114）

「摩」是探察對方情緒（「揣情」）的技術，「揣情」成功在於使對方外貌變現符合其心理的情緒。勸說者不該使對方意識到自己在使用「揣情」之術，否則便不會輕易表露情緒。而懂得「摩」的藝術，就能百戰百勝。

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期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同上，頁 114）

由此可知，「摩」的藝術有十個重點：「平」、「正」、「喜」、「怒」、「名」、「行」、「廉」、「信」、「利」和「卑」。「平」指安靜，「正」指上正直，「喜」指快樂，「怒」指發觸，「名」指發揚，「行」是言行，「廉」指廉潔，「信」指期待，「利」指追求，「卑」指諂諛。

另外，《鬼谷子》的注者陶弘景提出如下的說法。第一為：

謂揣知其情，然後以其所欲切摩之，故摩為揣之術。內符者，謂情欲動于內而符驗見於外。揣者見外，符而知內情。故內符為揣之主也。⁶⁹

意為瞭解對方的情緒，以對方所欲為主，則可操縱，因此用「摩」藝術的人，目的在使對方表露情緒。第二為：

揣者所以度其情慕，摩者所以動其內符。⁷⁰

意為「揣」的目標是瞭解對方心裡隱藏的情緒，而「摩」則瞭解如何操縱其情緒。第三為：

言既揣知其情所趨向，然後以其所欲微切而摩之，得所欲而情必動；又測而深之，如此則內符必應。⁷¹

意思是先必須瞭解對方情緒的趨向，然後以「摩」藝術抓住對方的情緒，如此其心裡狀態一定會符合外貌的表現。第四為：

情在於內，摩之可得⁷²。

意思是情緒在於心理，並且可以用「摩」藝術操縱。

⁶⁹許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頁 114。

⁷⁰許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頁 115。

⁷¹許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頁 116。

⁷²許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頁 115。

總而言之，由上述四段文字可知，「揣」指研究對方的心理，「摩」指研究對方心理的技術。筆者認為「摩」是一種修辭學，因為其目標是以被勸說者的心理情況進行說服。另外，《鬼谷子》的「情」也類似亞里士多德的「情緒」類，二者都是勸說的焦點，能操縱對方的心理，說服就能成功。

第二節 《戰國策》強調「情緒」的重要性：以張儀與蘇秦說韓王之言為例

一、蘇秦之言

〈韓策一〉記載蘇秦為趙⁷³王奔走天下，遊說楚、韓、魏、趙和燕的國君，聯合對抗秦國。此章紀錄蘇秦訪問韓王，遊說他加入合縱。他論說之理由如下：

第一個是說韓國軍隊很強大：

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溪、墨陽、合伯[膊]。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鞬、鍔、鐵幕，革抉、𠂔(𠂔)芮，無不畢具。(《戰國策箋證》，卷十六，頁 1479—1480)

⁷³此章開頭說：「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按照此文之說，派蘇秦去韓的國王是楚王，但是，據鮑彪和吳師道說，「楚」誤字，應該是「趙」。所以，派蘇秦去韓的不是楚王，而是趙王。參見《戰國策箋證》，頁 1480 - 1481。

蘇秦如此描述韓軍：一、二句說韓國之弓弩的力量，並且提及各種弓弩的名字。三、四句有相同表達方式，說韓國的劍很利，各物皆可斷。也提及劍的名字：鄧師、宛馮、龍淵和大阿。也提到出差的地方：冥山、棠溪、墨陽和合伯。第五句提出韓國的其他武器：堅甲、盾、鞬鍪、鐵幕，革抉、呿芮。

蘇秦之所以詳細描述韓國軍隊的武器，是為了擴大其力量。就是說，只說韓軍很強，一定會打敗秦國，是沒有說服力的；但提及諸多指涉韓軍力量的具體事物，便能使韓王的心理切實把握韓軍很強的意思與印象。

第二個是韓王服事秦國一定會帶來大禍：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同上，頁 1480)

此段言論，部分表述方式與上述相似，用誇大的修辭表明秦國貪得無厭，說秦王先會要求宜陽和成皋；然後韓王沒有土地的時候，秦王還是會要求更多，並且當韓王無法給予秦王更多土地時，秦王還是會不高興而為韓國帶來患難。

第三個是服從秦王是很丟臉的事，不僅害了韓國人民，還會被天下取笑：

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筑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同上，頁 1480）

蘇秦特別強調不抗秦是懦弱的表現，表述這個意思先用俗語：「寧為雞口，無為牛後」，然後提出反問⁷⁴：「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使韓王思考自己的行為，最後用排比⁷⁵（夫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表示擁有強大軍隊又賢明的韓王，若屈服於秦王，是很羞恥的事情。

此章結尾說：

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同上，頁 1480）

可見蘇秦以「情緒」勸說韓王之心，在第一個和第二個論點，蘇秦激勵韓王對抗秦國，提出其軍士的力量及勇敢，在第三、四個論點表示服從秦既是可怕的，也是很丟臉的。遊說的結果是，韓王發怒說無論如何都不會服從秦王。

⁷⁴本論文第四章將論述「反問」的定義和用法。

⁷⁵「排比」和「對偶」很像，其不同處有三：其一，前者字數不一定相等，後者字數一定要相等；其二，後者需要兩兩相對，而前者不用；其三，後者避免字同意同的結構，而後者平常運用此結構。見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頁 199。

二、張儀之言

〈韓策一〉也記載張儀勸韓王屈服秦王，運用兩種論點，第一是毀滅韓王的自信，提出其弱點：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廩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微亭郭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戰國策箋證》，卷十六，頁 1491）

張儀以五個指韓國之弱的句子誇張此一意思，一共提及韓國的三個弱點：農田不沃（一、二句）、土地不大（第三句）、軍隊不強（四、五句）。

第二個是威脅韓王不臣服於秦王的可怕後果：

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跼蹐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踈後，踢間三尋者，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裨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壓)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願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戰

國策箋證》，卷十六，頁 1491－1492）

張儀強調秦軍的力量，詳細描述其軍旅的數量。張儀表示韓國無法與秦抗衡，與秦軍爭戰，如同以嬰兒、懦夫對抗孟賁或烏獲一般，⁷⁶換言之，一旦雙方交戰，韓軍馬上就會打敗，因此韓王最好的選擇便是不要加入合縱，而服事秦王，否則韓國將面臨極大的危險。

第三個是說合縱之士的壞話，讓韓王討厭他們：

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同上，頁 1492）

張儀批評王侯，說他們被合縱的說客欺騙，認為自己很強而妄想能夠稱霸天下，但實情並非如此，他們實際上很弱，無法與秦競爭。

第四個是動之以存在的希望：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願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為敝邑，秦王必

⁷⁶孟賁和烏獲是戰國時期兩位勇士。

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
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同上，頁 1492）

意謂如果韓王服事秦王，並且送給秦國要求的土地，韓國就不會受害。

張儀最終感動韓王的心，使他服從秦王，並且痛恨合縱。此章的
作者敘述說服的結果如下：

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筑帝宮，祠春秋，稱東藩，
效宜陽！」（《戰國策箋證》，卷十六，頁 1492）

總而言之，蘇秦、張儀兩位說客的言論以影響君主的心理為主，並以此
勸服韓王。

第三節 掌握被勸說者的心：以張儀與司馬錯說服秦惠王之言為例

亞里士多德《修辭學》說，演講者之言必須提到帶來利，帶來正義與榮譽，讓聽者認為其建議不僅對國家有利，而且是正義與榮譽的事。⁷⁷上面看到《韓非子·說難》中有類似的觀點：辯士一定要瞭解對方的心理狀況，如果他想要得到榮譽（「名」），要教他怎樣做以帶來名譽；如果想要得到財富（「利」），就要教他怎樣做才能帶來財富。而在《戰國策》中記載張儀與司馬錯互相競爭要說服秦王的言論中，也可見到類似的論說內容。

⁷⁷ W.D. Ross, *Aristotelis Ars Rhetorica*, 1358b-1359.

〈秦策一〉記載張儀與司馬錯於秦惠王面前討論伐韓與伐蜀何者對秦國最好。張儀認為最好的策略是進攻韓國，司馬錯則認為是進攻蜀國。秦王最後聽從司馬錯的意見。二者言論很相似，都主張秦王聽其意見，就會帶來財富（「實」）與榮譽（「名」）。《戰國策》記載司馬錯與張儀的爭論如下：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弊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

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戰國策箋證》，卷三，頁201-203）

第一段文字中，張儀勸說秦王最好是攻韓、周、燕、楚四國，因為若進攻周，秦惠王就能獲得九鼎而被視為天子，以此成名，天下一定會聽其命令。張儀將三川和周室當作是天下的市場和朝廷。於前者追求榮譽（名），而於後者則求財富（利）。此外，張儀認為秦國之所以不該攻蜀，乃是因為吞併此土地不會讓秦王獲得美名，也不會得到財富。

而第二段文字中可見司馬錯的意見，他不同意張儀的想法，主張攻蜀，他提出兩個理由：其一、蜀有財富以及很豐富的土地；其二、蜀民族很野蠻，秦國吞併此國，必能獲得「正亂」之美名。其三、攻韓代表與周、楚、魏、齊四國打仗，不僅很危險、容易受害，並且還會獲得「劫天子」的「惡名」以及「不義之名」。

由上述分析可知，張儀與司馬錯運用同樣的修辭策略，說如此做則得乙之名、獲甲之實；反之，若隨著對方的建議，就取乙的惡名而受甲的損害。張儀認為能帶來美名與財富的是攻韓，而司馬錯則認為是伐蜀。以前者來看，與蜀打仗對秦國無利，也不會獲得美名，而後者則認為帶來惡名以及損害的是攻韓。

得乙之名獲甲之實，取乙的惡名受甲的損害，是《戰國策》中較

常見的修辭策略。除了〈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之外，於其他章節，策士也將用類似的修辭策略，如〈秦策四〉、〈齊策一〉、〈燕策二〉：

1.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鋤推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就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戰國策箋證》，卷六，頁 395—396）

2. 南梁之難，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伐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且見亡，必東愬於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戰國策箋證》，卷八，頁 508）

3. （蘇代）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眾，猶鞭策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塗，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匱，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

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
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與
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戰國策箋證》，卷三十，頁 1764—
1765)

由上可見，正如前文提及《韓非子》所論，遊說最大的困難是掌握對方的心理狀況。對方有時要得財富，有時要獲榮譽，有時表面上追求榮譽，心裡卻要財富，有時心裡要榮譽，但是表面上則像是要獲得財富。因此說者面對國君要得財富，就要教他如何取得；若國君追求名譽，就要勸誘他如何得到，否則便會導致遊說失敗。

然而，為何張儀和司馬錯使用類似的勸說方式（獲名得實），秦惠王卻聽從了司馬錯，這或許可由秦惠王的心理切入分析。從《戰國策》其他篇章可知，秦惠王不喜歡與大國打仗。〈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章載蘇秦試圖說服他用秦軍統一天下，秦惠王表示：

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
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
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戰國策箋證》，三卷，
頁 141)

蘇秦說服他很多次，但秦惠王始終不聽他的建議，認為秦國不夠強，以一隻鳥作比喻，如果翼不大，無法飛很高。由此可知秦惠王認為即使秦國很強，卻不能夠面對很多敵人。

另外，於〈齊助楚攻秦〉章也可見此態度，秦惠王因為齊，楚兩

國的聯盟而失了曲沃。他要伐韓國，但又怕兩國聯盟，因此為了使齊楚斷交而請張儀出使：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歡，子為寡人慮之，奈何？」

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並幣，臣請試之。」（《戰國策箋證》，卷四，頁 230）

張儀出使的結果是：

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
（《戰國策箋證》，卷四，頁 231）

張儀先用外交斷絕齊、楚兩國的聯盟，以免與兩強國戰爭。所以，自〈蘇秦始將連橫〉與〈齊助楚攻秦〉兩章可知秦惠王怕與縱橫最強的國家同時打戰，因此，蘇秦建議他統一天下，他當然不會聽從。

回到攻蜀與伐韓的選擇上，張儀建議他伐韓，而且進攻周、魏、燕、楚四國；司馬錯則建議他攻蜀而得到「正亂」的美名和蜀國豐富的財富。由於秦惠王怕大國，因此不敢貿然與大國交戰，也不想進行沒把握的行動；反之，正因為秦惠王覺得自己的國家不夠強，而司馬錯的建言正可令國家更強盛富足，所以最終接受了司馬錯的意見。由此可說，司馬錯之所以說服秦惠王，是因為切合了惠王的心理狀況。司馬錯瞭解秦惠王，一方面怕強國，另一方面想富國強兵，又要獲得美名，因此其言論能夠打敗當時傑出的辯士張儀。此外，即使無法斷定是《韓非子·說難》影響《戰國策》，抑《戰國策》影響〈說難〉，但是此章節可以證

明，《韓非子·說難》中提出的懂得對方心理的勸說理論，可說符合戰國時代真實的境況，並且也可以用此理論來說明秦惠王為何聽司馬錯之言。



第四節 韓非子「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以〈秦武王謂甘茂〉為例

〈秦策二〉記載秦武王意圖併吞周室，但是秦、周中間有韓國，故秦王欲攻韓而詢問甘茂。甘茂於是去遊說魏國聯秦攻韓，秦王請向壽輔助他，表面是為了幫助他，其實上是為了監視他。⁷⁸甘茂在魏國的路程請向壽回去建議秦王勿攻韓。秦王於息壤接待甘茂，問他為何不該進攻韓。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闢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戰國策》，卷四，頁 251—252）

此段言論的歷史背景是宜陽之戰（前 308—307 年）。秦武王欲攻韓之時，其左右有來自韓國的樗里疾和公孫衍，因為他們的立場是反對攻韓，所以說甘茂的讒言。甘茂知道此一情形，故雖然他與秦王的目標都是進攻韓，卻先說攻韓的種種困難，假裝自己不願意這樣做：

⁷⁸王晶雄、商景龍、管秀：《戰國策與論辯術：歷史的啟示》，頁 254。

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併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為多張儀，而賢先王。（同上，頁 252）

然後引用其他名將的例子，說明自己若建議攻韓，則會受讒言：

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孫侈之怒也。（同上，頁 252）

然後以曾子的寓言勸說秦王相信他：

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逾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同上，頁 252）

秦王則說自己不會聽信讒言，並與甘茂在息壤訂立盟約。這個盟約的內容是率領秦軍攻韓：

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

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同上，頁 252—253）

由此可以思考此問題：甘茂一開始的言論表現出不欲攻韓、害怕困難與讒言等消極的態度，為何秦王最後仍立他為將領？筆者以為上述《韓非子》所謂「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可以解釋此故事。首先，甘茂在出使後先遣向壽表明不願攻韓，以此瞞天過海，先迷惑樗里疾和公孫衍以免受讒言。其次，在息壤見秦王時，甘茂是故意運用消極的態度說明伐韓的困難，而知秦王一定不會接受其建議。因為若一開始即建議攻韓，而後秦軍遭遇困難，樗里疾和公孫衍一定會說是甘茂的錯，如此秦王會指責他，⁷⁹若是如此，其對於秦王的影響力必定會減少。

同時，為了避免君王的不信任，以曾子的寓言為例，表示連最孝順的曾子也因他人讒言而受難。⁸⁰甘茂的意思是請秦王不要相信樗里疾和公孫衍的話，此論點的邏輯是，非常孝順的曾子的慈母，三人說其兒子殺人而投杼逾牆，甘茂之德不高於曾子，所以君王一定不會相信他。秦王雖然執意攻韓，又自信不會聽信讒言，但仍與甘茂訂立盟約，則甘茂至少可以保全自身。即使表面上君主不理他，實際上達到目的：秦王

⁷⁹戰國策注解者橫田惟孝注：「甘茂伐韓而王止之，公仲移必謂伐韓者，非王之意也，茂也，是茂受怨也。」（《戰國策箋證》，頁 257）

⁸⁰曾子寓言修辭功能也可理解為「知事達理」，就是以某一個事件或者事態使對方思考一個道理，轉變其原本的思想。對方應該對提及事件或者道理熟。甘茂運用此故事強調君臣忠義和信誠的重要性。見：王晶雄、商景龍、管秀：《戰國策與論辯術：歷史的啟示》，頁 253 - 257。

信任他，立為秦軍統率。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甘茂知道發言須符合情勢，也懂他說的話於君主有什麼影響，知道若直接跟秦王說要攻韓，樗里疾和公孫衍一定會誹謗他，使秦王不信他，因此，即使欲攻韓，但是假裝勸說秦王不與韓爭，以免受讒言。

第五節 結語

古典雅典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情緒」是最能影響對方思考的要點，想說服成功者，必須說符合對方心理的論點。另外，亞里士多德說發言人給對方的影響也不可不察，對方不相信發言的人，無論說多有道理的言論，也一定不會聽。

《韓非子·說難》具有類似的觀念，認為言論最困難的是懂得對方的心理，就是瞭解對方想要利益還是美名。另外，《韓非子》也提出與亞里士多德「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很接近的觀念。提及鄭武公大夫和富人鄰居的故事表示不同人的言論，在不同的情況下說服的結果完整不一樣。

《鬼谷子》有「揣」和「摩」二種觀念，前者係對對方心理的觀察，後者則係對對方心理的觀察的技術。另外，《鬼谷子》也認為被遊說者的外表往往不會表明其情緒，而是會隱藏於心裡，因此勸說者「揣情」的方法是對對方心理面於其外表的表現。

《戰國策》中的士也以君主的心理境況的說服他。蘇秦和張儀說服韓王，乃以情緒動其心。作者記載韓王聽說蘇秦的言論，很激動說絕對不要屈服秦國，而聽張儀之言，則很激動說要屈服秦國。

至於張儀和司馬錯的爭論，可見二者從「利」和「名」的角度勸說秦王。司馬錯建議攻蜀國，而獲得「正亂」的美名及蜀肥沃的土地。反之，張儀認為併吞周室才能帶來財富和美名。



由甘茂的事例可知「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是策士非體察不可的修辭策略。甘茂與秦王欲攻韓，但是甘茂怕遭遇韓國的樗里疾和公孫衍的誹謗，因此，建議秦王不要與韓交戰，而且以曾子的寓言，對秦王表示怕由於樗里疾、公孫衍的誹謗而不信他。秦王不聽，但是與甘茂訂立甘茂領導韓軍的盟約，甘茂因此順利獲得其目標。

第四章 《戰國策》的修辭技巧



前言

本章討論《戰國策》言論的修辭技巧。首先，筆者將於第一節中運用傳統西方修辭學的三個技巧分析《戰國策》，這三個修辭技巧分別是設問、運用歷史典故和訴諸權威。除上述修辭技巧以外，筆者於第二節將運用「寓言」的論說技巧，將分析《戰國策》中關於老虎的四個寓言。第三節則是論述設問、訴諸權威、歷史典三種修辭技巧。另外筆者也將討論，這四個修辭技巧的一個主要功能是打動對方的心。

第一節 修辭技巧簡述

按照西方的修辭學理論，演講的準備有五個部份：第一是論點的尋找，⁸¹勸說的人要找出能說服對方的論點。假設一個人想請老闆提高薪水，應該想出能說服老闆的理由，如努力工作，幫助公司賺很多錢，提出對公司很有利的計劃，需要多一點錢養自己的家庭等。

第二，則是論點的安排，⁸²論說的人要思考什麼安排是最適合的。以上述例子而言，不應該一開始就請老闆提高薪水，也不應該提出其家庭經濟境況，因為一般公司老闆不太可能會擔心他人的問題。他們所擔

⁸¹拉丁文: *inventio* 古希臘文: *εὕρεσις* 參見 Lausberg, Heinrich, *Handbuch der literarischen Rhetorik; eine Grundlegung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 260 - 442, 此書歸納古代希臘和羅馬修辭學家的理論。

⁸²拉丁文: *dispositio* 古希臘文: *τάξις* 可見 Lausberg, Heinrich, *Handbuch der literarischen Rhetorik; eine Grundlegung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 443 - 452.

心是公司的收入，因此，最適合的安排是先跟老闆說有對公司很有利益的計劃，如果他相信，員工就會獲得老闆的注意。然後，為了說服老闆他是對公司也有貢獻的人，可以運用努力工作、讓公司賺很多錢兩個論點，加強老闆對員工的重視。最後，員工看到老闆重視他的時候，就可以提出家庭的境況，如果老闆繼續理他，就可以請他提高薪水。

第三，則是表達論點的方法，⁸³也即如何表述提高薪水的請求。比方說可以用「設問」解釋計劃，如「老闆，您知道如何變成事業最成功的公司嗎？」或者也可以直接表明他是很努力的員工。

第四，則是背誦演講內容，⁸⁴著名演講者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羅，即使說話很自然，但他們演講還是用背誦的。演講者想出論說內容後，應該用有效率的方式背演講稿。羅馬政治人物老加圖（Cato Maior）認為，演講不用背，但必須要很清楚地意識到要講的內容。他說 *rem tene, verba sequuntur*。就是說，你要把握意思，詞彙就會隨著你。

第五個是實行演講，⁸⁵即演講者的動作、表情或聲音。上述這位員工解釋他的計劃應該表現很認真的表情及聲音，但是提出其家庭經濟境況，則應該表現出能使老闆憐憫他的神情。

⁸³拉丁文：elocutio 古希臘文：λέσις。可見 Lausberg, Heinrich, Handbuch der literarischen Rhetorik; eine Grundlegung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 453 - 1082.

⁸⁴拉丁文：memoria。可見 Lausberg, Heinrich, Handbuch der literarischen Rhetorik; eine Grundlegung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 1083 - 1090.

⁸⁵拉丁文：actio 或者 pronuntiatio：可見 Lausberg, Heinrich, Handbuch der literarischen Rhetorik; eine Grundlegung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 1091.

修辭技巧屬於演講準備的第三個部份，其功能是有目的地表述一個道理。修辭技巧是中華修辭學家最注重的層面，而研究《戰國策》修辭的學者最注意的也是技巧。



筆者認為《戰國策》有三個與古代希臘、古羅馬演講很相似的技巧，分別是設問⁸⁶、歷史典故⁸⁷以及訴諸權威⁸⁸。「設問」是用問題的方式，很熱烈的肯定一個道理，提出對方找不到答案的問題。歷史典故則以史事為據，辯論道理時，往往舉出歷史上值得效法或鑑戒的人物，因此與訴諸權威很相近。歷史典故⁸⁹如《戰國策》〈秦王使人謂安陵君〉、〈八年謂魏王〉兩章所載：

1.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

⁸⁶ 設問是西方修辭理論的 *interrogatio* 或者 *ἑρώτημα* (§767 - 770) 中國修辭也有此修辭，陳望道對設問的定義是：「胸中早有定見，話中故意設問，名叫設問。」見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頁 134 - 136。

⁸⁷ 歷史典故是西方修辭理論的 *exemplum historicum* 或者 *exemplum maiorum* (Lausberg, Heinrich, *Handbuch der literarischen Rhetorik; eine Grundlegung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 290, 323, 411, 412)。

⁸⁸ 訴諸權威是西方修辭理論的 *auctoritas* (Handbuch der literarischen Rhetorik; eine Grundlegung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 426)。

⁸⁹ 鄒濬智先生也提及此修辭策略，稱為「援引史實、以古為鑑，說服對方」。見鄒濬智〈《戰國策》辭令辯論學研究〉，《遠東學報》第二十四卷第四期，頁 342。

侵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魏策四〉，《戰國策箋證》，卷十九，頁1468）



2.八年（闕文），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穡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魏策四〉，《戰國策箋證》，卷二十五，頁1416—1417）

第一則事例，唐且提及三個史事，表明秦始皇發怒不如「士」發怒那麼嚴重。第二則事例，魏國之客以史事表明依靠楚國是有害的。

訴諸權威則可見於〈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齊宣王見顏觸〉兩章：

1.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狄之長也，弊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

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翁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秦策一〉，《戰國策箋證》，卷三，頁 202)

2. 「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齊策四〉，《戰國策箋證》，卷三，頁 641)

第一則事例，張儀運用俗語來訴諸權威，⁹⁰其功能是對秦惠王表示強調吞併周室的重要性；而第二個事例，顏觸引用老子之言加強「士重君輕」的道理。

設問的例子則可見於〈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蘇秦始將連橫〉兩章：

1. 臣固疑大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秦策一〉，

⁹⁰關於春秋和戰國時期辭令有所不同，陳彥輝先生認為，自國家的制度而言，春秋與戰國是不同的時代。前者的政事是貴族的，國君與貴族商議策略。另外，即使諸侯的權力與周朝獨立，尚保持禮樂的文明。至於戰國時代，平常打戰，禮樂崩壞，君主將貴族由自己設立的官僚取代，給地位更低的「士」參與政事的機會。此時代的變遷影響到二者的言論特色。例如於《國語》和《左傳》往往引《詩》和《書》。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必須對二者很熟悉，否則就會被視為沒有智慧的人。《戰國策》則引《詩》五次，《書》五次。另外，《戰國策》引用《詩》、《書》的地位於俗話一樣。見陳彥輝：《春秋辭令研究》頁 160 - 168。

《戰國策箋證》，卷三，頁 141)

2.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策一〉，《戰國策箋證》，二十六卷，頁 1480)

第一則事例，蘇秦勸說秦惠王統一天下，以先王的歷史境況比喻當下處境，並且教導他隨追古代君主統一天下，正亂立安，這個歷史典故結以設問「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功能是加強歷史典故的意思，使秦惠王通過思考發現他必須用戰爭統一天下。第二則事例蘇秦對韓王指出，服從秦國是很丟臉的事，設問的技巧與引用俗話的「訴諸權威」一起運用。俗話是「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意為必須對抗強大的敵人，千萬不要甘心於服從強國，為其附屬。設問「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其功能是激發韓王思考這件事，並自己發現服從秦王真的是很丟臉的事情。

如下筆者除了上述修辭技巧以外，也將分析寓言。⁹¹

⁹¹寓言是戰國末年很常見的論述技巧，春秋晚年的寓言並不多，一共有九則，到了戰國末期，文學作品通常具有寓言，一共有兩百八十九則。《戰國策》與《韓非子》兩書的寓言很豐富。前者一共有六十一則，後者一百三十三則。饒龍隼：《上古文學制度述考》（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316。寓言是一種例子，其目的是表明某一個道理。

第二節 寓言：以四個老虎的故事為例



一、老虎在論說中的意象

寓言中的人或動物，通常代表某些很具體的意象。以西方寓言傳統為例，狐狸表達狡猾，狼代表惡性以及凶猛，羊代表受難的單純人。戰國時代也如此，《戰國策》寓言中動物也具有固定的意象，例如老虎代表權力、力量。策士或說客常常以「虎狼」兩字形容秦國的兇殘，如在〈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秦攻趙於長平〉三章：

1.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公由，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者，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西周策〉，《戰國策箋證》，卷二，頁 90）

2.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

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

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楚策一〉，（《戰國策箋證》，卷十四，頁 788）

3.（虞卿曰：）「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戰國策箋證》，卷二十，頁 1114）

上述三則言論，蘇秦、游騰、虞卿三人的目標是教君王抗拒秦國，並且阻止加入連橫服從秦王。三者運用的論點是，秦王很野蠻，其擴充土地的慾望無法滿足，不重視禮義，因此是不「不可親」的國家。虎狼的意象指凶猛野蠻，不懂人類的習慣，有無人道的行為，也就是說具有「不可親」的意象。其修辭作用是強調，秦王「不可親」的意象。

老虎也代表很強盛的國家，如在〈頃襄王二十年〉一章：

楚人有黃歇者，遊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點鬪，而驚犬受其弊，不如善楚。」（《戰國策箋證》，卷六，頁 400）

黃歇以老虎鬥比喻楚和秦的戰爭，對昭王表示兩個非常強大國家的意象，其目的是阻止秦國攻打楚國。

《戰國策》寓言也用老虎表述一個國家很暴力或者很強。以下筆

者將透過四個寓言分析「老虎」的意象及修辭中的用法。



二、四個老虎的寓言

1. 狐假虎威

「狐假虎威」的故事見〈楚策一·荊宣王問群臣曰〉章載：

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戰國策箋證》，卷十四，頁 755）

此則寓言中，老虎的用法是給君主自信。江一把昭奚恤比喻成一隻利用老虎威勢的狐狸。他把昭奚恤看做是一隻狡猾的狐狸，把北方國家看做是百獸，把楚王看做是一隻老虎。楚宣王擔心北方的國家服從昭奚恤，江一要說服楚王不應該擔心昭奚恤，因此說昭奚恤是一隻狡猾不強的狐狸，讓與老虎一樣強的楚王以為北方的國家服從他。因此，此寓言的修辭作用是鼓勵楚王，給他自信，不要怕昭奚恤。

2. 管莊子刺虎

承上所述，老虎的功能一方面是給對方自信，而另一方面也比喻

危險的事。〈秦策二·楚絕齊齊舉兵伐楚〉章載：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楚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鬥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人而鬥，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

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聽無失本末者難惑。」（《戰國策箋證》，卷四，頁 238—239）

齊國打算討伐楚國，楚王派陳軫到秦國與秦王講和，陳軫用寓言來說服秦王。這則寓言的內容是，管莊子要殺兩隻正在爭鬥的老虎，可是管與制止他說不應該馬上殺他們，最好是等強的老虎殺掉弱的老虎；而強的老虎一定會因此受傷，所以這樣更容易把他殺掉。在這個寓言中，楚國和齊國是兩隻老虎，而秦王是管莊子。陳軫用此寓言說明秦國介入齊楚的戰爭，如同妄想一次刺殺二隻打鬥中的老虎，不僅沒有好處，而且非

常危險。陳軫想告訴秦王的意思是，齊、楚兩國和老虎一樣強，如果要征服此二國，應該先等他們互相傷害，等楚打敗齊之後，國力因而耗弱，秦國就可以獲得勝利。他之所以把齊和楚與兩隻互相爭鬥的老虎作比較，是爲了強調這兩國很強。因此其修辭目的是說服秦王與楚講和。

3. 虎怒決蹢

見〈趙策三·魏魀謂建信君〉章：

魏魀謂建信君曰：「人有置系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蹢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蹢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蹢，害七軼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蹢也。願公之熟圖之也！」（《戰國策箋證》，卷二十，頁 1163）

魏魀想要告新建信君，楚王之所以不幫助他，是因為如果幫助他，就會讓楚國受到損害。魏魀以老虎作比方：有人設了一個捕獸的繩套，套住老虎的爪子，老虎咬斷自己的爪子逃走了。在這個寓言中，老虎是楚國，老虎的爪子是建信君。魏魀的意思是，楚王不會幫助建信君，因為楚國雖然是強國，但不會為了建信君而損害自身。魏魀用老虎作比喻，不直接說楚很強，而說建信君只是老虎的一個爪子，表明楚之大和建信君之小，並且表示建信君對楚王不是很重要。

4. 獸不知虎

第四則故事是獸不知虎，在這則事例中，老虎的功能是阻止君主與小國戰爭以免大國危險。〈趙策一·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章載：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

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楚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己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己，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己也，而尚相鬪兩敝，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戰國策箋證》卷十八，頁 1008）

陳軫⁹²於此故事敘述兩隻動物互相爭鬥，不知有老虎逼近牠們，因此老虎得以趁機吃掉牠們。這個寓言比喻山東諸國互相爭鬥，而不懂得秦國是一個威脅。山東的國家互相打仗，不知有老虎一樣凶猛的秦國在逼近。策士的意思是不應該互相爭鬥，以免秦國滅亡他們。

總之，筆者認為在上述四個寓言中，老虎是一種說動對方之心的技巧，一方面代表了強大、甚至殘酷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代表著隨之而來的恐懼。在「管莊子刺虎」的故事中，陳軫以恐懼阻止秦王同時與齊、楚打仗，恐懼的工具是說二國是老虎。而在「狐假虎威」的論說中，楚王之心缺之自信，江一跟楚王講他是一隻老虎，不用怕一隻只會說謊的狐狸。而在「虎怒決蹢」的故事中，魏魄用老虎和爪子，使建信君明白他是不大的一位君主，阻止其驕傲的行為。關於「獸不知虎」的論說，則是策士用老虎的比喻使山東國家懂得秦國的凶猛，阻止他們互相打

⁹²吳師道認為說者為陳軫。見：《戰國策箋證》，卷十八，頁 1009。

仗。



第三節 歷史典故、訴諸權威和設問的勸說事例論析

一、歷史典故與先王的意象與功用

本節先分析〈魏策二·魏惠王死〉章。魏惠王去世，舉行葬禮時下大雪，魏國的臣子請太子改日子，太子不聽，因此他們找惠公勸說改葬禮的日子。惠公用的論點是，因為太子要保護百姓，所以葬禮必須改期。⁹³其言論的結構是：首先運用周文王的歷史典故，然後提及該則歷史事件與當時境況的關係：

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嚙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於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戰國策箋證》，卷二十三，頁 1319—1320）

惠公以周文王為例，批評太子的做法。戰國時代歷史的作用是以史為鑒，承先啓後；善君之道必隨，暴君之惡必行。於此章結尾，作者強調此一歷史觀念：

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

⁹³王晶雄、商景龍和管秀，從「應變能力」的角度，分析惠公的論述方式。所謂「應變能力」指反駁說服力很強的能力。魏國太子因為孝順，所以堅持要如期舉行其父的葬禮。孝順是道德的重點，因此反駁此說法很難。惠公的策略是以文王之言調整太子的道德觀，並且懂其心理，這樣才說明太子改葬禮的日子。說見：王晶雄、商景龍、管秀：《戰國策與論辯術：歷史的啟示》，頁 12 - 16。

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同上，頁 1320）

於此可見，作者將「文王之義」當做必須依循之道。另外，惠公也運用設問的技巧：

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急）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保佑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

（同上，1319 頁）

文中的設問是：「得毋嫌於欲亟（急）葬乎？」意為難道太子不懷疑這麼急舉行葬禮有問題嗎？，其問題的目標是使太子思考自己的行為有「不義」之處。

其次，《戰國策》往往提出「先王」以闡明道理，例如〈魏策四·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一章載：

（關文）獻書秦王曰：「昔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受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者），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不）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為武教，得密須

氏，而湯之服桀矣。今秦國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鄆、郢。（《戰國策箋證》，卷二十五，頁 1413—1414）



有人獻「書」給秦王，阻止秦王進攻魏國，勸說他往楚國出兵⁹⁴：這些言論最後可見提及歷史人物的例子以及設問的修辭，這些歷史人物為湯、桀、紂、武四個君主。湯、武是商、周王朝的創建者，此處也比喻強的善君。桀、紂則是夏、商王朝的末代君主，指弱而無德的暴君。此論點的邏輯是秦王作為善君，應該以其強的軍隊進攻既弱而又無德的楚國。

《戰國策》中的策士往往提到具有典範意象的「先王」，建議王侯效法之；而以桀和紂的失敗阻止、警戒之。筆者將提及三個例子，第一為〈魏策一·魏武侯與諸大夫〉章：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

王鍾（錯）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

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業，不從此也。

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山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

⁹⁴鮑彪注：「（南方）為楚」。說見：范祥雍、范邦瑾：《戰國策箋證》，頁 1414。

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眾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戰國策箋證》，卷二十二，頁 1251-1252)

魏武侯⁹⁵於西河說山河能夠保護自己土地，吳起卻不同意，甚至表示如此的想法一定會使國家滅亡，魏武侯發怒問他何故。吳起乃論說魏國不危險，並不是依靠其天險，之所以有危險，是因為治理不好，並以桀和紂表述此主張。桀雖然有天門、天溪、廬翠、伊和洛的天險，但終究因治國不好而被湯取代。另外紂即使其國被孟門、漳、釜、和其他的山河保護，但是因為沒成為善君，而遭到武王的討伐。

第二個例子為〈秦策五·四國為一〉章：

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其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戰國策箋證》，卷七，頁 477)

⁹⁵魏文侯的兒子，西元前 396 至 371 年在位，說見：楊子彥《戰國策正宗》，頁 371。

姚賈提醒君王勿聽讒言，表示此做法與桀、紂一樣，他們聽讒言殺了「良將」以及「忠臣」，因此國家滅亡、自身也難逃死劫。姚賈的意思是，若君王聽讒言，就不會有忠臣，將導致亡國。



第三個例子見〈齊策四·齊宣王見顏觸〉章：

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慢驕奢，則凶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媿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戰國策箋證》，卷十一，頁 640—641）

於此文可見，顏觸以堯、舜、禹、湯、周文王表明其道理，說明王必須重視「士」，不該因為其名尊位高，就忽略自己的缺陷，羞於教於別人。

二、勸說技巧的綜合運用：以蔡澤對應侯的 言論為例



〈秦策三·蔡澤見逐於趙〉章記載蔡澤為了要取代應侯，去秦國拜訪他，並勸他辭官。蔡澤讓應侯一方面害怕在秦國朝廷吃虧，另一方面希望很快樂的退休。同時《戰國策》在此章也提供關於應侯和蔡澤心理狀況的重要說明。

蔡澤說服應侯用的論點與結構可歸納為幾個階段：首先，使人通知應侯蔡澤將要取代他。其次，蔡澤故意對應侯表現不合禮的行為，激怒應侯而展開關於是否取代他的對話。第三，在勸說內容中，蔡澤問應侯如何看待商鞅、白起、大夫種等名臣受難而死的歷史。應侯知道蔡澤的意圖，故辯解說他們是以善為主的官員，即使受難，後代的人會記得他們的道德。蔡澤則進一步反駁說此行為適合有德之時，有無德的君父時，此做法代表會被殺，而且犧牲生命不是救國家，而是帶來大亂。最後，應侯被蔡澤的論點動搖，蔡澤藉機表示其言論主要的道理是到成功之極的時候，萬物盛極必衰，必須引退，否則一定會受難。

在蔡澤勸服應侯的過程中，可以見到上述勸說理論，如「情緒」與本章所論三種修辭技巧的綜合運用：

蔡澤到秦後，並未直接訪問應侯，而是先派人以傳話的方式向應侯示威而激怒他：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

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戰國策箋證》，卷五，頁 358）



《韓非子·說難》強調「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的重要性。⁹⁶蔡澤也懂得類似的道理，先讓旁人告訴應侯其能力不高於蔡澤，所以必由蔡澤取而代之，因此應侯召見他。

《鬼谷子》〈揣編〉、〈摩編〉的重點是，勸說者要瞭解對方在心中隱藏的情緒，並誘使其表現出內心真正的狀態。⁹⁷蔡澤用類似的策略說服應侯。首先此章敘述其「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的行動即是一種策略，並成功使應侯發怒。接著，蔡澤見應侯時，對他表現出不尊重、無禮的行為，使他更生氣：

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同上，頁 358）

作者也敘述蔡澤對應侯的影響：「應侯固不快」，顯示蔡澤在正式進行勸說之前採取的種種行動，已經影響了應侯的情緒。然後，應侯問蔡澤既然欲取代他，那麼其說詞為何。蔡澤則用三段設問式的論說漸次切入重點，使應侯思考商鞅、白起、大夫種的出處問題：

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

⁹⁶說見本文第三章。

⁹⁷已見本文第三章。

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

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同上，頁 359）

作者特別敘述「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說明應侯聽到此一設問，明確地知道蔡澤的目標是用這三個歷史人物的悲慘下場恐嚇自己。所以應侯不再對蔡澤之言稱「然」，而是加以辯解：

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死，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死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固毀譽，必有伯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不可哉？」（《戰國策箋證》，卷五，頁 359）

應侯認為商君、吳起、大夫種三人功勞很多，並且對君主很忠誠。即使被君主所殺，但是獲得後世美名，可說是死而無憾。蔡澤則反駁他說：

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知，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

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

（《戰國策箋證》，卷五，頁 359）



蔡澤以比干、子胥和申生為例，說明忠孝未必能救國家，並且表示如果要死後才能肯定其人的價值，則微子、孔子和管仲都不是聖人、君子了。應侯說有道理，因此蔡澤知道有非常好的機會勸說他辭官。《戰國策》作者特別敘述其言論的成效：「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由此可知，蔡澤使應侯將自己最害怕的事情表露出來，即是擔憂被國君殺害。即使無法證明蔡澤的做法是因為《鬼谷子》的影響，也不能夠證明鬼谷子學蔡澤論述的方法，但是可以肯定戰國時代有此種論述的方法。

蔡澤與應侯講的道理是，為官必須在最成功的時候退隱，這是一種自然的道理，尊重此理就能很快樂地過日子，違反這個道理就會受到很大的困難而死。蔡澤主要的修辭策略是恐懼和希望。他用修辭技巧的功能是有效率地表述恐懼和希望兩個情緒。

第一次運用歷史典故勸說即是上文蔡澤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詢問應侯的看法。即使不講三者的故事，但因為此三人是極為有名的臣子，故應侯一聽就懂得蔡澤的意思，而心裡產生害怕的情緒。由此可說，此三名歷史人物是一種比喻，代表那些對國家很有貢獻的忠臣，但是也代表那些因沒有在適合的時間引退而受害。應侯和蔡澤關於他們有不同的看法，對前者來說商鞅、白起和大夫種是忠臣，而蔡澤則認為他們屬於那些該退的時候不退的人。

蔡澤懂得應侯對商鞅、白起和大夫種的理解與自己不同。蔡澤的意思是，只要君主無明，智慧、孝順都沒有用。此道理應侯可以接受。蔡澤知道應侯可以接受此道理，於是詳細講商鞅、白起和大夫種的故事，加上吳王夫差、夏育、太史啟、齊桓公和吳起的故事，表示他們自身雖然道德高尚，一旦遇到道德品質不善的人，仍然受難，並且強調他們之所以受難是因為最成功的時候沒退隱：⁹⁸

蔡澤……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同上，頁 359—360）

在此章中，蔡澤運用許多設問的技巧：首先，在一開始遊說應侯時，即用兩次設問。此二個設問的功能，是誘使應侯的情緒出現。而在批評「忠臣孝子」的傳統觀念不足以幫助國家的論述時，也運用同樣修辭功能的設問：「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

其次，蔡澤使用設問的技巧，也同時配合歷史典故運用，增加其說服力，如：

⁹⁸鄒濬智提及蔡澤的歷史典故，並且有與本人類似的想法，認為這個技巧的目的是「證明自己『功成人退，否則就會身敗名裂。』」。說見鄒濬智《〈戰國策〉辭令辯論學研究》，《遠東學報第》頁 342。

「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

「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

「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分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同上，頁 359、361）

並且也有做結論的功能，如：

「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

（同上，頁 361）

此外，蔡澤也用來自民間的俗語產生「訴諸權威」的效果：「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此功能是加強歷史典故表述的道理，就是為官者必須在達到成功的時候離開。

蔡澤的言論對情緒分析很有貢獻，可見他如何操縱被勸說方的情緒，也可見韓非子與鬼谷子所提出理論的實際應用。雖然我們無法瞭解究竟是韓非子和鬼谷子影響《戰國策》，抑或是後者影響前者，不過本文的目標並非論述誰發明操縱心理的原則，而是證明此原則是戰國時期常用的修辭策略。

第四節 結語

修辭技巧的功能是有效率的表達一個道理，並能打動對方的心。

本章第二節，筆者從「情緒」分析老虎的修辭功能，可見策士運用老虎的敘述目標是：一、表示某一個國家很暴力，此國往往是秦；二、提醒對方某一個國家很強，造成威嚇或恐懼的效果；三、鼓勵對方，使對方相信自己的力量。

第三節論述歷史典故、設問和訴諸權威的修辭功能。魏太子即使天氣不好，而且百姓不欲舉行魏王的葬禮，但是他不想改日期。惠公提及文王的做法及說法，並且以設問加強其道理，如此才阻止魏國太子的驕傲行為。

《戰國策》也論述策士提及桀和紂表示某一個國家或王侯又弱又無德。為阻止君主做一件事，策士也運用桀和紂的史事，說明君主的做法是與二者一樣。相反地，策士提出堯、舜、禹、湯四善君時表示某一個做法是對的，也表示王侯又強又賢。

最後，在〈蔡澤見逐於趙〉章，可見運用極佳的各種歷史典故，蔡澤以商鞅、白起和大夫種為例，說明做官者在地位達到最高的時候必須退隱來保全自身。此外，蔡澤也用設問和訴諸權威的方式加強其論點。另外，由此也可知《鬼谷子》「揣情」的理論確實可能實際應用在策士的勸說中。蔡澤之所以提及商鞅、白起和大夫種的悲慘結局，是因為要觀察應侯反應，如此使應侯表現出其情緒，並且使言論符合其心理狀況。

第五章 《國語》、《左傳》、《戰國策》修辭觀異同

前言

《戰國策》常被視為「亂世之學」⁹⁹，或被指為放棄道德、以利為主的作品。相對的，《國語》、《左傳》則皆講究道德，以勸善為主。而在修辭目標的討論上，也具有如此二分的傾向：《戰國策》的言論求利，而《國語》、《左傳》求善。筆者於此章節想討論是，《戰國策》追求利益，並不一定代表捨棄道德，而是有自己價值觀的趨向。¹⁰⁰因為時代與社會、學術背景的改變，《戰國策》與《國語》、《左傳》不同，其價值觀以百姓為主，而《國語》、《左傳》則以貴族為主。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論述修辭與道德的關係，討論老子、孔子和墨子的修辭觀。第二節綜論《國語》與《左傳》以善為主的修辭特色；第三節論述《戰國策》以利為主，但不棄道德的意義；第四節討論《戰國策》具有的策士價值觀與《國語》、《左傳》的不同之處。

第一節 修辭與道德關係論述

一、老子、孔子、墨子修辭與道德觀

⁹⁹熊憲光：《戰國策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年），頁2。

¹⁰⁰《戰國策》不能說有系統的思想，因此，筆者用「價值觀的趨向」稱之。

修辭與道德往往處於矛盾的狀態，戰國時代¹⁰¹的思想家認為有口才不一定是好的。老子《道德經》說：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56 章，《老子四種》，頁 48—49)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81 章，《老子四種》，頁 66—67)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65 章，《老子四種》，頁 57)

18、56、81 章皆表達出有智慧的人並不崇尚言辭，美言不一定可信等價值觀。65 章則表述古代聖人認為智慧與詐騙是並行的，百姓有智慧的話國家便有偽詐，所以統治者不會使人民狡猾，而是使他們單純，如此方為國家之福。關於上引第 65 章，王弼《注》曰：

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多智巧詐，故難治也……智，猶治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也。當務塞兌閉門，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偽，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思惟密巧，奸偽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王弼集校釋》¹⁰²，頁 197)

¹⁰¹ 老子和孔子生平，有人認為時在春秋，有的認為已到戰國。筆者認為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即使有可能是在春秋時期成立，但是符合戰國時代的思想。另外，二者的徒弟皆是在戰國時代論述其主張。

¹⁰²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臺北：臺北，1992)，頁 197

王弼認為「明」的意思是人民被詐騙而不單純，智慧多，詐騙就多，並且有智慧的人會動心操作，因此有很多智慧的人便很難治理。自王弼的註解可知，老子對善於操縱辭令的策士持批評的態度，因為他們以其智慧騙人民，並且使他們變得不單純。

孔子，也批評逞口才的人，提出對巧言的觀點：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論語正義》，卷一，頁 4）¹⁰³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衛靈公〉，《論語正義》卷十八，頁 13）

上述有所謂「巧言」，指那些欺騙聽讀者的論點。¹⁰⁴「巧言」的人缺乏仁愛，而且其言擾亂道德。

不過，孔子並非完全放棄修辭，他同樣認為完整達意的口才是很重要的修養。¹⁰⁵ 孔子強調修辭必須符合道德：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論語正義》，卷十五，頁 1）

意為，言者必有德，說話必符禮。又說：

¹⁰³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臺北：中華叢局，1958）。

¹⁰⁴ 陳彥輝，《春秋辭令研究》，頁 28-31。

¹⁰⁵ 陳光磊，王俊芳《中國修辭學通史》，頁 27-37。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憲問〉，《論語正義》，卷十七，頁 2）



道德品質好的人，說話一定會是好的，但是說話很好，道德品質則不一定是好的。

下一節我們將看《國語》和《左傳》具有與孔子相同的修辭觀，三者修辭皆以道德、仁義為主。

就墨家而言，其修辭觀與儒家略有相似之處，並且強調以真為主的論述方式，也重視具有名實相符特質的修辭，認為若名稱不合於實質，則國家將混亂。墨子批評當時諸侯說：

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非攻〉，《墨子閒詁》¹⁰⁶，卷五，頁 490—491）

墨子說，當時各國之所以一直戰爭，是因為君主聽信、盲崇美名而不將現實考慮清楚，像盲人一樣，會說詞卻不會認物。墨子也認為辯士不應該利用他人的蒙昧而藉機獲利。以墨家來看，辯士的義務如下：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小取〉，《墨辯集詁》卷十一，頁 23—24）

¹⁰⁶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意為辯者要區分是非，考察治亂的規律，明白萬物的異同，審察名稱和實質是否相符，權衡利害，解決嫌疑。由此可知，墨子修辭概念是以言求真，以免受美言迷惑。



總之，老子、孔子和墨子都提及修辭與道德的關係。老子提醒讀者美言以及智慧對人民的危險。雖然如此，不代表全然反對修辭，而只是指責那些以假亂真，破壞百姓單純的巧詐之人。¹⁰⁷孔子認為君子一定有口才，與小人的差別在前者說話有德，而後者說的是「巧言」。

二、對策士口才的批評

戰國時期策士的游說技術受到後代人的批評，可以由以下三個例子觀察。第一個是司馬遷對蘇秦的評論：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
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
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
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列
傳第九蘇秦〉，《史記會注考證》，卷六十九，頁 889)

由司馬遷的敘述可見，後代的人對蘇秦的遊說藝術感到顧忌，看不起他。但司馬遷卻認為其口才很傑出，也因此而為其立傳。

¹⁰⁷西方學者常常以筆者提及的文字認為老子反對修辭。見：Jensen, Vernon J, "Rhetorical Emphases of Taoism." *Rhetorica*, 頁 219-29。中國學界也如此理解老子修辭觀，如鄭子瑜先生見其《中國修辭學的變遷》，頁 3。Lu Xing 女士反駁此種法說，老子批評的是那些胡說八道的人，並不反對修辭，見：Lu Xing (1998): *Rhetoric in Ancient China*, fifth to third Century。

第二個例子是《荀子·臣道》的論述：

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故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荀子集釋》，卷十三，頁 289）¹⁰⁸

於此可見，以道德品質區分高低，有四種臣子，程度最高是「聖臣」，而最低是「態臣」。而蘇秦、張儀兩位著名策士，他們的缺點是遊說技巧中具有詐騙，因此被荀子指為最低之「態臣」。

第三個例子來自《漢書·武帝紀》：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漢書·百官公卿表》卷一，頁 155—156）¹⁰⁹

當時的丞相衛綰請罷「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由此可見漢人對戰國策士言論的批評，認為他們的言論「亂國政」。

總之，上述批評都與策士的修辭之術相關，荀子、司馬遷、漢書對張儀和蘇秦的批評重點是他們的遊說藝術，因為具有詐騙，並且亂國。

¹⁰⁸ 李滌生：《荀子集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

¹⁰⁹ 楊家駱：《漢書》（臺北：鼎文書局印行，1981）。

第二節 《國語》與《左傳》的修辭觀

《左傳》、《國語》是很有名的歷史書，也是極佳的文學作品。通過二書所載錄的史事，也可以瞭解春秋戰國時的政治思想概況。二書都是給當時士大夫讀的，其目的是教育，使人辨別善惡。故《國語》、《左傳》可說具有以善為主的價值觀。

一、《國語》、《左傳》都具有教育的目標

由〈楚語上〉可見《國語》的目標是政治道德教育。士亹問申叔時如何教導莊王的太子，申叔時說：

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楚語上〉，《國語集解》，卷十七，頁 485-486）

由此可見當時的教育資料有《春秋》、《世》、《詩》、《令》、《語》、《故志》以及《訓典》，各書都有教育的作用。就《語》而言，其作用是「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也就是說，太子之所以要學習各國善的言論，是為了發揚自己的道德，並且讓他瞭解古代的國君如何用道德來治理人民。

二、《國語》、《左傳》以歷史人物言行表述道德觀：以「驪姬之亂」為例



《國語》與《左傳》都記載驪姬事蹟，二書所載相當類似，其價值觀或史觀也有共通之處。首先，關於驪姬如何說服晉獻公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國語》記載如下：

驪姬賂二五，使言于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晉語一〉，《國語集解》，卷七，頁 261—262）

《左傳》記載如下：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

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
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
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桓
公二十八年，《春秋左傳注》，頁 238-241)

二書都記載驪姬想要立其子為晉國的繼承者，所以費盡心機使太子申生
受難。從說服的角度來看，其言論是有效的，晉獻公聽從她的意見，但
是對國家則有害而導致動亂。《國語》作者¹¹⁰記載驪姬：「是故先施讒于
申生」，意為驪姬毀謗申生。《左傳》則說驪姬勾結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說服晉獻公：「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
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意思是驪姬為
立其子奚齊為繼承者，說服晉獻公將太子申生、重耳、夷吾派離國都較
遠的曲沃、蒲城和屈。

另外，《國語》、《左傳》有其他關於驪姬的事跡強調其惡性。《左
傳》僖公四年說：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
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
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
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

¹¹⁰就《國語》、《左傳》作者的問題而言，筆者認為兩本書有很多不同的作者，並非同一人的作品。關於此問題，可參見張以仁：〈論《國語》與《左傳》的關係〉，《張以仁先秦史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1 - 72。



『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
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
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
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
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
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
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
「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春秋左傳注》，頁 295-300）

就修辭角度而言，此段文字很豐富，其主要功能是指責驪姬之惡以及晉獻公對驪姬的愛情，並且肯定太子申生的孝順態度。就人物性格而言，作者描述驪姬為一個又狡猾又邪惡的女子。作者詳細描述驪姬的惡性，詳細講述驪姬如何歸罪申生，強調她的壞心：申生要獻給晉獻公祭祀的酒肉，晉獻公在打獵之際，驪姬在申生所獻的酒肉下毒，並故意使晉獻公發現酒肉有毒。《左傳》作者特別強調毒性很厲害：「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另外，驪姬歸罪申生時，《左傳》作者表明她的險惡說：「姬泣曰『賊由太子』」，就是驪姬哭泣說太子有毒害獻公的用心。至於晉獻公，作者藉申生太子之口，呈現出晉獻公因愛驪姬而做出不合理的事情。此段文字也表明太子申生是很孝順的兒子：他為了不損害其父親，不回晉都聲辯冤情而選擇自殺。

同時，《左傳》強調晉獻公不應該立驪姬為夫人，故追述曰：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

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僖公四年《春秋左傳注》，頁 295）



此預言有文學價值：表示太子申生之善及驪姬之惡，將太子比喻為薰，而以驪姬為蕕。薰是一種香草，蕕則是臭草。卜人也說「攘公之瑜」，意為驪姬將盜竊您（晉獻公）的牡羊。牡羊也是比喻，指太子申生。作者用卜人之言來證明晉獻公不應該立驪姬為夫人，《左傳》借卜人的預測來做歷史判斷。

上述《左傳》的事件也見於〈晉語二〉第一章。¹¹¹驪姬跟晉獻公說太子申生一定會謀弑他：

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眾，眾不利，焉能勝狄？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疆，又失言于眾矣，雖欲有退，眾將責焉。言不可食，眾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國語集解》，卷八，頁 275）

驪姬要說服晉獻公太子申生打算弑父，她創造一個似是而非的理由來使晉獻公以為申生有殺他的惡意。根據她的詐騙，申生獲得了民心，由人民的支持而戰勝狄國。她的說辭意圖使晉獻公認為，太子申生戰勝狄國的唯一理由是擁有人民的支持，而不是因為他自己；而擁有民意支持，

¹¹¹見《國語集解》，卷八，頁 275-281。

必促使申生發難而無法回頭。



上述我們見到《左傳》作者怎麼敘事驪姬騙晉獻公讓他以為太子申生要弒殺他這件事情，此事《國語·晉語一》也有記載：

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
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驪姬受福，乃置鴆于酒，
置堇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
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

（《國語集解》，卷八，頁 279）

總而言之，《國語》、《左傳》中的驪姬其實是很有說服力的人物，但是她使用口才的目標並不善良，她以口才騙晉獻公，使他以為非常孝順的太子申生陰謀將取他而代之，是故受到《國語》、《左傳》完全負面的評價。

三、言論講德：以晉悼公為例

《國語》和《左傳》敘述作為暴君的厲公被殺之後，¹¹²繼位的悼公將說服大夫支持他。晉悼公對大夫說：

既弒厲公，欒武子使智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逆
于清原。公言于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

¹¹²在《國語》、《左傳》中的厲公是無德之君，二者強調他的「不君」。見：李師隆獻：〈先秦傳本 / 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臺大中文學報》第 32 期（2010 年 6 月。）

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而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也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國語集解》，卷十三，頁 402-403)¹¹³

《國語》和《左傳》敘述晉國暴君厲公被殺後，¹¹⁴悼公將說服那些敢於弑君的大夫支持他，開頭說他之所以即位，是因為天的欲望，而不是自己想要。於此悼公以天命辯解為何他要即位。然後他描述善君的特色，並且教大夫棄惡君而服善君，但是也提醒他們既然決定立君主就不要再放棄，顯示出其對於弑君之臣的顧忌。

悼公將此意思表達多次。此段文字可以分成兩個部份：第一個部份是「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而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這個部份同時有兩個小部份：第一個是從「若稟」到「是穀不成也」，第二個是從「穀之不成」到「二三子之虐也」。每個小部份是一個對偶，每個對偶又分成兩組。第一組是「若稟

¹¹³ 此事件也見《左傳》成公十八年（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906-907）因為《國語》較詳細，所以此處以《國語》為主。

¹¹⁴ 在《國語》、《左傳》中的厲公是無德之君，二者都強調他的「不君」。見：李師隆獻：〈先秦傳本 / 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臺大中文學報》第 32 期（2010 年 6 月。）

而棄之，是焚穀也」，第二組是「其稟而不材，是穀不成也」。第一部份第二組跟第二個部份的第一組有關，悼公以「是穀不成也」將二者連在一起。還有，第一個小部份第一組跟第二個小部份第二組也有關，「成而焚之」這句話把二者連接起來。

這小部份的基本意思是，如果國君治國治得好而放棄，就是大夫的不對，但是如果悼公治理國家治得不好，就是晉悼公自己不對。但是悼公不是用一般的方法表達這個意思，而是用比喻，把放棄好的國君這件事叫做「焚穀」，而把國君治理國家治得不好叫做「穀不成」。如此他的言辭顯得更加美麗。

第二個部份是：「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此段文字說明若國君不好，確實應該廢棄；而好的國君則不必廢掉。最後，悼公點明其言論主旨：「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也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意為眾大夫決定放棄或尊重身為國君的自己，必在「今日」之內決定。悼公並對此再三致意：「將在今日」、「也在今日」、「願由今日」，運用此種再三反覆的修辭，強調其即位意願而不願重蹈厲公覆轍的決心。

此事件也見於《左傳》成公十八年：

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也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

《春秋左傳注》，頁 906-907)



即使《左傳》所載悼公之言較為簡略，但是二書作者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意圖表明悼公的道德品質。

總而言之，《國語》、《左傳》，都記載晉國大夫接受悼公為君，並且沒有對抗他，因此可說悼公得利。即使如此，此章作者的目標恐怕並非表明悼公的修辭技巧或者口才，而是以悼公之言，表明善君之德，傳授後人治國之道。這就是《國語》、《左傳》二書言論講述道德的目標。

四、聖人的評論

《國語》和《左傳》都有民本思想，¹¹⁵教君主關心百姓。鄭國的子產代表此思想。《左傳》對子產各種載錄也表明對其思想的肯定，如記載子產與子太叔說：

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昭公二十年，《春秋左傳注》，頁 1421)

子產在死前告誡他，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夠以寬大使百姓服從。如果對人民嚴格，人民就會害怕；但如果對百姓太寬大，國家也會有危險。子太叔執政的時候用寬方治國，但因其德不如子產，因此導致鄭國盜賊很多，

¹¹⁵ 此說於本章第四節將有更詳細的論述。

子太叔無法控制。最後《左傳》作者引用孔子言論評論此事：¹¹⁶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也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昭公二十年，《春秋左傳注》，頁 1422）

孔子的意思是，以寬大治國，百姓就輕慢，但是用嚴厲治國，百姓就傷殘。引用孔子的評論，是一種訴諸權威，其功能為將子產的道理立為一真理。由此可知，孔子的評論功能也表明《左傳》的價值觀，並且是一個以善為主的修辭觀。

即使聖人的評論在《左傳》比較常見，但是《國語》也偶然可見，例如〈晉語一〉驪姬欲害太子申生，向晉獻公進讒言。晉獻公被說服，因此派太子申生攻東山。此事之後《國語》以僕人贊與「君子」之言加以評論：

驪姬曰：「以臯落狄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于眾也，與眾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狄，則善用眾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倣，倉

¹¹⁶ 學者懷疑《左傳》中孔子的評論是原本有還是後代人所加的。見：李師隆獻〈《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論〉，《臺大中文學報》第 32 期（2010 年 12 月）。

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否，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裒之衣，佩之以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讒何！」

申生勝狄而反，讒言作于中。君子曰：「知微。」（〈晉語一〉《國語集解》，卷七，頁 266—267）

僕人贊聽聞晉獻公賜予申生出兵前之物，便論說申生此行的危險。僕人贊講完之後，作者說太子申生勝狄歸國，遭遇讒言，再引用「君子」評以「知微」。於此可見，「君子」之言的修辭作用乃是支持僕人之言，並且表明其心驪姬講述巧言，以假亂真的事實。

五、語結

《國語》與《左傳》的修辭目的是道德教養，言論的目標並非表明高級的修辭技巧，更不是以口才得利。驪姬的言論，修辭技巧很好，道德品質卻很惡劣。另外，悼公說話很有說服力，但是此言論的目標是道德教養，而不是修辭技巧。此外，二書的人物勸諫之言，君主往往不聽。如上文所舉關於子產及僕人之例中，子產提醒太叔不該對人民很嚴，也不該太寬，太叔卻不懂此道理，最後讓鄭國的盜賊氾濫；孔子言論的作用為說明子產的想法不錯，可是子太叔未完全懂。僕人贊則提醒太子

申生，回歸晉國會遭遇讒言，申生卻不聽，「君子曰」的作用是表示僕人贊之言是對的。



第三節 《戰國策》以利為主，但不棄道德

《戰國策》常被視為亂世之書，重利輕義，但《戰國策》中的策士是否完全忽略道德，還是需要更多的討論。事實上，《戰國策》中仍可見策士提供君主求善的意見，並且他們的成功帶來和平與安定，如〈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章載：

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國不能行也。（《戰國策箋證》，卷三，頁 141—142）

由上文可見，蘇秦提到修辭不求義的境況，是以語言迷惑君主。即使蘇秦的目標是自己得利，但同時也提醒秦王，當時君主的道德已不如前代的先王。

本文第三章第三節討論過，《韓非子》認為被說者「心」之所欲乃是「利」和「名」；並舉司馬錯以「利」（利益）、「名」（榮譽）的論點勸說秦惠王攻蜀國加以說明。其用「名」的論點是攻蜀而獲「禁暴正亂之名」，如果攻周，就會得「惡名」及「不義之名」。由此可見，「名」仍屬於或連結於道德的範圍。司馬錯的言論不僅限於教秦惠王求取財富，

也教他求「義」。由此一修辭角度言之，策士不能完全捨棄道德，因為當時的君主仍欲獲取美名；而獲美名，乃是非訴諸道德不可的事情。



根據《戰國策》作者載錄，蘇秦說服趙王後的結果是：

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同上，頁 143）

由此可見，蘇秦說服趙王的結果，使得諸侯間沒有戰爭，人民得以幸福過日子；而設立合縱，也使秦不敢進攻之國。作者認為蘇秦的做法是「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就是說國家和平地相處不用戰爭。即使蘇秦之所以說服趙王是因為要得利，但也確實因合縱之策抵抗秦國而讓天下安定。

另外，〈秦策一·張儀說秦王〉章載張儀的言論：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戰國策箋證》，卷三，頁 172）

文中張儀強調以道德治國的重要性。那些亂治國的君主，一定會使國家滅亡。換而言之，張儀的意思是，以道德為主之國必能成功，無道德則必然失敗。當然，張儀講的道德比較接近法家，以富國強兵為主，與傳統貴族的道德觀完全不同。¹¹⁷

另外，筆者認為，策士求利，不代表必定使對方受害，反而有時也關心其利。即使有策士害人的故事，¹¹⁸但是也有很多策士尋求的是令對方也得利。例如〈齊策四〉所載馮諼客孟嘗君的故事：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遍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

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

「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曰：

「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

¹¹⁷ 〈張儀說秦王〉章可見很多屬於法家思想的言論，如「言賞則不使，言罰則不與，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等語。見《戰國策箋證》，卷三，頁171-199。另外，此言論和韓非子的《初見秦》幾乎一樣。學者認為這兩段文字應該是同一個人所寫，但作者身分問題目前很難有定論。見：孫少華〈〈初見秦〉的作者與戰國末年古書編纂問題蠡測〉，《欽州學院學報》，24卷5期，2009年，39-43頁。筆者認為，此言論應該是秦國國君很喜歡的。秦始皇依循法家思想治國，而且立此思想為秦國唯一的學說。韓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因此，很有可能秦始皇將韓非子立為此言論的作者。

¹¹⁸ 《戰國策》有敘事商鞅和韓非子受難的故事，二者皆因讒言而死。見：《戰國策箋證》，卷七，〈秦策五〉頁476-478；卷三，〈秦策一〉，頁135-136。

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曰：「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國〕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

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戰國策箋證》，卷十一，頁 621—622）

對馮諼而言，「義」是可以購買、交換的，這可說是一種「以利為主」的思維無誤，但他有此作為，卻也是關心、保護孟嘗君的表現。由於馮諼的策略，孟嘗君於齊國去官之後，薛人都歡迎他。惠王聽到請他加入魏國的朝廷，齊王聽到魏王欲孟嘗君歸國。馮諼建議不歸，留於薛。如

此孟嘗君得已完成三窟，此後沒遭遇到任何禍患。



其次，本文第四章所舉蔡澤說服范雎之言，也可見其言論也是從保護對方切入，之所以建議辭官，是因為怕秦王不需要他的時候就殺了他。而蔡澤此後於秦國為官，在適合的時間也同樣去官：

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秦策三〉，《戰國策箋證》，卷五，頁 361）。

於此可見，蔡澤自處之道，與他給應侯的意見，同樣都是生命一旦有危險，就該辭官歸隱，可說並無矛盾。換言之，蔡澤建議應侯辭官，不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也確實能保護應侯。

另外，於〈齊策三·孟嘗君出行國〉也可見到求互相得利的策士。孟嘗君於門口公告曰：

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戰國策箋證》，卷十，頁 606）

同樣之言，若於《國語》、《左傳》中，必理解為一種諷刺，或者被批評，但是在《戰國策》則可理解為真誠、無諷刺的語氣。由此故事內容也可以瞭解孟嘗君是真的想要獎勵那些以私心做對國家有貢獻的事情的人。孟嘗君出巡，至楚國時，收到一個象牙的牀。楚王使登徒送給孟嘗君，但是因為象牙的牀是很貴的禮物，不敢送給他。因此游說公孫戍讓孟嘗君不接受禮物。他說：

「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

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同上，頁 606）



公孫戍聽從登徒之言，與孟嘗君說：

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同上，頁 606）

意謂，因為楚國與其他國家關係很複雜，所以接受此禮物必定會帶來麻煩。孟嘗君聽從他，決定不接受楚王的象牙牀。公孫戍出去的時候，孟嘗君發現他很高興，懷疑他說：

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同上，606 頁）

公孫戍回答說：

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同上，頁 606）

公孫戍說有三件事使他高興，其中一件是「諫而止君之過」，就是此言論能避免孟嘗君遭遇麻煩。另外則表明自己也可以獲得「寶劍」的賄賂，聽到這句話，孟嘗君非但沒有生氣他為私利高興，反而命令他接受登徒寶劍：

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

（同上，頁 606）



筆者認為此故事的意思是，雖然私心不好，但仍可以帶來好處。在當時孟嘗君的情境中，接受禮物形同欠下人情債務；若不接受，則不須回報楚國。換言之，如果登徒沒有因為害怕承擔弄壞象牙牀的責任，而公孫戍沒有貪得登徒的寶劍，則孟嘗君很有可能因受楚國之大禮而遭到問題。註解此章節的司馬光在最後一段說：「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諛之心，猶將用之，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乎？」¹¹⁹意為孟嘗君左右，只要言論有貢獻，無論有沒有出於私意、私利的考量，都可以接受。

另外，蘇秦尚未得到趙王重用時，因為缺錢而去見李兌，他特別講述其經濟困難的背景：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里）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篚羸滕，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趙策一〉，《戰國策箋證》，頁 968）

蘇秦，說自己很窮，而且希望求見李兌談重要的事情。李兌接見他。蘇秦說得很有說服力，但是有舍人偷聽，並與李兌說：

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

¹¹⁹ 《戰國策箋證》，卷十，頁 609。

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同上，頁 968）

根據舍人的看法，李兌辯論能力及智慧都比不上蘇秦，因此建議他不要聽蘇秦的策略。李兌知道自己無能，怕被蘇秦欺騙。舍人送蘇秦離開時，蘇秦察覺有異而問他說：

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同上，頁 968）

舍人回答曰：

先生之計大而視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

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同上，頁 969）

舍人與蘇秦講為何建議李兌不聽，說其做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蘇秦的策略李兌不能施行。雖然如此，也仍然讓蘇秦獲得所需的錢財：

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

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為用，西入於秦。（同上，頁 969）

李兌送給他很多財富。由此可知，舍人之所以建議李兌不聽蘇秦，是因為其能力及智慧很高，實李兌所不能及；同時若李兌勉強重用蘇秦，也可能導致舍人失去既有利益。雖然如此，舍人使蘇秦離開的方法，並非害他，而是給予他利益財富。換而言之，即使舍人有私心，但是以財富避免李兌重用他，如此，雙方皆得利。

第四節 《戰國策》具有策士的價觀與《國語》、《左傳》不同

道德指「人類共同生活時，行為舉止應合宜的規範與準則」¹²⁰，意即某些生活中可以依賴、憑藉的標準或價值觀。本節將論析《戰國策》的價值觀是與《國語》、《左傳》不同的，前者有布衣的價值觀，而後二者則是屬於貴族的。

首先，《戰國策》的主角人物是「士」，現代華文翻譯為「策士」。透過《戰國策》的閱讀，可知很多「士」的相關資訊：策士來自貧窮的家族，其社會、經濟地位欲有所提升，全仰賴成功說服君主。以蘇秦為例，在他主張聯合合縱之前，先經歷在秦國遊說失敗，結果變得非常貧窮，連家人也看不起：

歸至家，妻不下紵，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

（〈秦策一〉，《戰國策箋證》，卷三，頁142）

不過在說服趙王合縱對抗秦國後，蘇秦就變成很有財富與地位的人，並且得到家人的尊重：

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范雎，綿（錦）繡千純，白壁百雙，黃金萬溢。……當秦之隆，黃金萬溢為用，轉轂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

¹²⁰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臺北：中華民國教育部，1994）

桑戶樅樞之士耳，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

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虺行匍伏，四拜自跪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

（同上，頁 143）

最後，蘇秦自己反省並感嘆說：

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可忽乎哉！（同上，頁 143）

由此可知，策士非重視財富不可，沒有財富，生活就很辛苦。

「士」與其他的布衣不同，他們學問更廣，而且懂政治。由《戰國策》所載可知「士」自認為與一般百姓不同：

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也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魏策四〉，《戰國策箋證》，卷二十五，頁 1468）

於此可見，「士」不會視自己與其他百姓一樣。秦始皇說百姓生氣就跪

下頭碰地，唐且回覆他說這是庸夫的做法，「士」之怒，則將弑君而引發天下動亂，並且舉例證明自己說真話，甚至拔劍做出試圖刺殺秦始皇的行為。



在其他章節也可見策士常常不尊重君主，以大膽的行為對待權位很高的人，〈齊策四·齊宣王見顏觸〉章載：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也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也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趨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戰國策箋證》，卷十一，頁 639—640）

顏觸不願向前拜見齊宣王，齊宣王當然不高興。顏觸則不但不向他道歉，反而告訴齊宣王國君不如策士那麼重要。齊宣王就更生氣，但是因為需要他，使其左右說服顏觸留於齊國，顏觸最後卻離開了。

由上述例子可見幾個特色，第一、策士雖然地位很低，而且對君主不尊重，君主卻仍聽從他們；第二，策士將自己視為能幫助國家的人材，認為國君不聽他們的計策，國家就會受苦。顏觸故事的道理是：策

士的能力對國家很有貢獻。《戰國策》是重視人才的一本書；¹²¹相對的，《國語》、《左傳》中的官，也是以文辭為功而很有智慧的人，他們各種言論也卻內容豐富，以善為主，但君主常常不聽他們。而《國語》、《左傳》作者常常強調君主不理會官而為國家帶來很糟糕的結果，如〈晉語一〉載：

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子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晉語一〉《國語集解》，卷七，頁 255-256）

史蘇提醒大夫晉國有嚴重的問題：驪姬利用晉獻公，而百姓受害。作為晉國的君主，晉獻公必須關心人民的福利，並且以德治國。

¹²¹曾劍：〈縱橫捭闔巧舌如簧《戰國策》思想和語言述評〉：《古典文學漫步》，頁 184 - 185。

於此段文字的最後，作者直接寫出後果，並用「君子曰」加以評論，以此表示史蘇之言未被採納，而驪姬果然使晉國動亂。筆者認為《國語》、《左傳》與《戰國策》其中一個共同處，在於三者都強調官、行人或策士的想法對國家的重要性，君王必須聽從。如宣公三年《左傳》載：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春秋左傳注》，頁 669—672）

楚莊王的軍隊功陸渾的戎人，其軍隊達到周國的時候，周定王派王孫滿慰勞。楚王問他王孫滿九鼎多大。王孫滿說鼎多大不如其德行高不高。依桀紂歷史典故，可以知道君主德行有問題，九鼎一定會被他國取走。

由閱讀《戰國策》可知，即使民眾沒有基本的權利，但當時大概仍有一種重視民意的思想。由下文可見君主必須聽臣下的意見：

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

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齊策一〉，《戰國策箋證》，卷八，頁 521-522）

由此可見，齊威王聽鄒忌的意見，擔心自己的貴族與人民不會指出他的錯誤，因此下令獎賞那些批評他的人。

另一個證明策士勇於斥責君主的例子為頓弱：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鉞推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

（〈秦策二〉，《戰國策箋證》，卷四，頁 395-396）

文中的「秦王」即是對人民相當暴虐的秦始皇。雖然如此，頓弱不僅沒有表示尊敬之意，甚至指責秦始皇沒有孝順的美名，也不會得到屬於孝順者的利益。但秦始皇即使勃然大怒，還是繼續聽他的論說，並且最後

接受他的建議：

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又放假、魏，入其將相。碑游於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必從，頓子之說也。（同上，頁 396）

由上述文字可知，《戰國策》重視民意的思想特點是：一：國君不僅重視貴族，同時也重視百姓的建議；二：策士用很大膽的態度，很直接提出君主的錯誤。

此類以民意為主要的思想也見於《孟子》：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盡心下》，頁 367）¹²²

當然，從歷史而言，很難肯定戰國時代有任何以民意為主的體制。也沒有保護策士生命的法律系統，策士在君主的面前提出他們的想法時，生命其實相當危險。

《左傳》、《國語》、《戰國策》都有所謂「民本思想」：統治者必須以百姓為主治國。筆者認為《戰國策》比《左傳》、《國語》更進一步，強調統治者不僅要對人民好，也必須聽其意見。

¹²² 焦循：《孟子正義》（石家莊：河北人名出版社，1986年）

當然，因為沒有限制君主權力的法律，君主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治理國家，甚至可以無人道地殺臣子。並且《戰國策》所載的歷史內容也未必全部可信，以上述提到的鄒忌故事為例，即使提及重視民意的思想，歷史卻不皆如此，反之，如齊威王便常常不聽旁人的意見。¹²³因此，可說《戰國策》整體上有一種以民意為主的理想，提出一個君主很歡迎意見，策士地位很高的境況。

另外，就思想而言，《戰國策》常常被視為縱橫家之書，但是實際上也有別的學派的思想；並且，也有很多思想家在《戰國策》中以策士的面貌出現。雖然沒有很清楚的學說，但是有反對戰國以前貴族思想的趨向。如：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鵲驚有餘食；下宮糲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齊策四〉，（《戰國策箋證》，卷十一，頁 662）

由此可見貴族與百姓在價值觀方面的差異。此章節主要的意思是，策士是來自貧窮的家庭，且常冒生命的危險來服侍國君。因此，不隨著管燕的士，道德行為沒有缺點。管燕無法帶給策士任何財富，士得不到財富

¹²³郭丹：《左傳國策研究》，頁 211。

就遭遇其家人看不起的境況，並且非常辛苦過日子。

此外，以「義」此一概念的分析，也可見具有儒家思想的《國語》和《左傳》與戰國策士思想的《戰國策》價值觀的差異。以〈魏策二·魏惠王死〉章為例，魏國太子與惠公對「義」有不同的理解。太子的理解是：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生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戰國策箋證》，卷二十三，頁 1319）

而惠公則認為：

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同上，頁 1320）

魏國太子的概念是，無論因下雪而百姓受不受害，作為孝順的兒子，必須如期舉行葬禮。惠公以文王之義為主，說太子最要當心的是百姓，因此必須改變葬禮的日子。《戰國策》此章節的作者於最後的部份做出評斷：

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同上，頁 1320）

由此可知，作者認為最善之「義」是惠公所主張者，因為其以人民為主。

惠公以歷史辯護自己：

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

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嚙其墓，見棺之前和。」

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

於是出而為之張於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同上，頁 1320）

另外，上文引頓弱的言論，也表明策士重「義」的特色。秦始皇想召見頓弱，頓弱要求如下：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秦策四〉，《戰國策箋證》，卷六，頁 396）

所謂「臣之義不參拜」，「義」指頓弱個人的價值觀。他要求秦始皇，只有尊重他的價值觀，才可以召見他。頓弱以這種行為，明顯的反對戰國以前傳統貴族的價值觀。

在上文提到的馮諼故事也有相同的「義」觀：

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

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戰國策箋證》，卷二十五，頁 1467—1472）

馮諼曾經問孟嘗君薛邑人民的債務要花在哪裡，孟嘗君說先看其家缺的什麼再花。馮諼因為孟嘗君所缺是「義」，所以燒債券，買「義」給孟嘗君。而此處的「義」，主要乃是對人民友善、寬宏的表現。

第五節 結語

《左傳》、《國語》、《戰國策》都富有對修辭研究很有貢獻的資料，透過閱讀三者，可以瞭解春秋與戰國時期論說的方式以及歷史背景。不過《國語》和《左傳》與《戰國策》所載言論的目標很不一樣：前二者求善，以道德教養為主；而後者重利，以說服成功為主。

《左傳》與《國語》的言論可當教學資料，表明善惡。驪姬的言論用的技巧，從說服力的角度而言，是非常好的，但是《左傳》與《國語》不強調她是好的辯說者，而是敘述她如何以假亂真致使晉國動亂。

《戰國策》常被視為棄德性而重功利，筆者不以為然，而認為《戰國策》即使追利，但是也會重視與貴族傳統價值觀不同的道德，其特點有：其一，雖然策士以自己的利益為先，但是不一定使對方受害；其二，策士出身貧窮家族，因此非重利不可，不然生活將會很痛苦，而且家人

一定會看不起他；其三，具有以民意為主的思想。其四，策士認為自己的建議對國家很重要，有一定的地位。



第六章 結論



戰國時代即使沒有現代的修辭概念，但是《戰國策》仍具有修辭學研究上很豐富的資料與價值。筆者認為有兩個理由：其一、士依口才得名獲利，勸說君主成功而得其重用。其二、王侯非常重視士的建議，靠他們的智慧治國，獎賞能夠提出好的策略的人士。二者是修辭發展的重要條件，因此，即使當時沒有現代的修辭學概念，修辭是士行業很基本的能力。

因為論述技術是士成功的關鍵，所以《戰國策》大部分章節提供士對君王或者貴族的意見，也會提及言論的背景及結果。現代人無法瞭解寫這些文章作者的目的，但是可以提出假設。筆者的假設是：《戰國策》重點在士的言論的章節，其中一個目標是辯論的教學，教讀者遊說的策略和技巧。《戰國策》少數章節敘事比較多，結構的重點不在言論；雖然如此，但是修辭學價值依然很高。由此可知，君主重視臣下的意見、有口才的人得重用、策士說服君主言論和背景。

春秋戰國時代有三部重要的作品：《國語》、《左傳》和《戰國策》。前二書記載的是君主與貴族往來之辭論述，其目標是表明貴族的價值觀，《戰國策》則追求策士之得利。因此《戰國策》常常被視為重利棄德之書。筆者則認為《戰國策》未完全捨棄道德，而是有自己的價值觀，其價值觀與《國語》、《左傳》不同。《國》、《左》的價值觀大致屬於貴族，故追求財富並非所需要的，而是希望後代人記得他們的道德。反之，《戰國策》中的士有社會最低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的特點是：一：即使策

士尋找自己的利益，但是往往也讓對方不受害損失；二：策士來自貧窮的家庭，因此非重利不可，否則生活很痛苦；三：有以民意為主要的思想；四：策士認為其言論對國家很重要。



戰國時代與古典雅典的共同處很多，其中三個是：一：二者都是很開放的時期，百姓可以論辯國事；其二：兩個時代都是禮樂崩毀的時期；其三：二者修辭的發展很大，修辭學在古典希臘出現，現代的學者還以亞里士多德《修辭學》中的概念為修辭學的基本，並且欣賞德摩斯梯尼的修辭技術。戰國時代，即使沒有作為獨立學科的修辭學，仍有很多對修辭學很有貢獻的資料，《戰國策》此類資料非常豐富。

從修辭理論的角度來看《韓非子·說難》的「心」和《鬼谷子·揣編》和《鬼谷子·摩編》中的「情」與亞里士多德《修辭學》中「情緒」(πάθος)具有相同的概念。三者皆認為說服最重要的部分是打動對方的心理。

韓非子認為遊說最困難的是懂對方的心理，勸說者要瞭解對方是否欲「利」還是欲「名」。〈說難〉也詳細描述對方不同境況，並且教勸說者如何面對。另外也提及一個與亞里士多德《修辭學》很接近的觀念，就是所謂「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ἥθος)，認為勸說者本身及言論的境況對遊說的結果有不可不察的影響，就是說同一言論在某一個境況有甲結果，但是在另外一個境況有乙結果。同樣一個言論如被甲說的有某一個結果，但是如由乙說的，結果就不一樣。

至於由〈摩編〉和〈揣編〉，我們可見「揣情」和「摩」概念，前者指對方心理的觀察，而後者則為對方心理的觀察的技術。對方一定不

會使勸說者知道其心理，因此勸說者必須使對方表現出心裡隱藏的想法，如此遊說才可成功。



筆者認為《鬼谷子》的「摩」與古代希臘修辭學（*τεχνή ῥητορική*）近似。理由有二：一、二者是勸說的藝術，瞭解心理的目標是說服對方。二、古代希臘修辭的基本是情緒，教演講者如何打動對方的心，古代希臘修辭家也論述如何操縱被勸說者的心理情況。

《戰國策》中的士也以君主的心理境況說服他們。以張儀和司馬錯的爭論為例，後者知道秦惠王覺得自己的國家很弱，不敢和強國打仗，因此司馬錯勸說秦惠王進攻蜀國，如此即可獲得「正亂」的美名，並且吞併土地很沃的蜀國。另外，以蘇秦和張儀勸說韓王之言為例，二者以情緒遊說韓王。根據作者所記載，蘇秦和張儀都說動了韓王的「心」。

由甘茂對秦王的言論，可見「勸說者對對象的影響力」的重要性。甘茂與秦王都要攻韓，但是甘茂怕遭到來自韓國臣子的樗里疾和公孫衍的讒言，因此勸說秦王不要攻韓，並且以曾子的故事，與秦王講怕因樗里疾、公孫衍兩人的誹謗而不信他。秦王不採納不攻韓的意見，並且與甘茂訂立盟約。盟約是甘茂領導秦軍攻韓。

至於《戰國策》運用修辭技巧，筆者分析其中有三個與古希臘、古羅馬的演講中常見的技法類似。三者是歷史例子、設問及訴諸權威。筆者分析了這三種技巧和寓言，認為其目標為打動對方的心。就寓言而言，以有老虎的故事為例，可見老虎的修辭功能是給君主自信或者以之恐懼阻止做某一件事。至於歷史例子、反問和訴諸權威，於〈魏惠王死〉

章可見，惠公用周文王之言勸說魏太子改變魏王葬禮的日子，並且以反問加強周文王的權威，其功能為阻止魏太子的驕傲。於〈蔡澤見逐於趙〉章，蔡澤以商鞅、吳起、白起和大夫種的歷史例子證明那些不在權力最高的時候辭官者一定會很殘酷地被殺，以反問以及訴諸權威，強調其道理，教應侯辭官而由自己取代他。於蔡澤也可見《鬼谷子》「揣情」的實用，以商鞅、白起和大夫種觀察其反應，而知道其心理狀況。

總之，《戰國策》是對修辭學歷史很有貢獻的作品，其修辭策略和技巧也很適合與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演講互相參照比較。希望此《戰國策》修辭研究能說是中西修辭學學術研究的連接。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司馬遷著，瀧川資言注：《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02年。

魏·王弼：《老子四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

清·武英殿：《史記》，臺北：新陸書局，1964年。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臺北：中華叢局，1958年。

李滌生：《荀子集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

邵增樺：《韓非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1990年。

范祥雍、范邦瑾：《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郁賢皓、周福昌、姚曼波：《新譯左傳讀本》，臺北：三民，2009年。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市：中華書局，2002年。

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許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焦循：《孟子正義》，石家莊：河北人名出版社，1986年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楊家駱：《漢書》，臺北：鼎文書局印行，1981。



楊子彥：《戰國策正宗》，北京：華夏，2008 年。

楊樹達：《漢書窺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

樓宇烈：《王弼集校釋》，臺北：臺北，1992 年。

二、近人論著

專書

丁禎彥、吾敬東：《春秋戰國時期觀念與思維方式變革》，長沙：湖南出版社，1993 年。

王晶雄、商景龍、管秀：《戰國策與論辯術：歷史的啟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王璇：《戰國策》遊說文化研究，江南大學，2009 年。

何晉：《戰國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

何新文：《左傳人物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范祥雍：《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胡如虹：《戰國策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宗守雲：《修辭學的多視角研究》北京：中國社會學科，2005 年。

施淑儀：《戰國策比喻修辭藝術深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7 年。

馬慧蘭：《戰國策論辯藝術研究》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0 年。

繆文遠：《戰國策考辨》，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過常寶：《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體及話語方式的生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



健主編：《先秦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

郭丹：《左傳國策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年。

郭丹：《左傳戰國策講演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臺北：文史哲，1989 年

陳彥輝：《春秋辭令研究》，北京：華正書局，2006 年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局 1992 年。

鄭杰文：《戰國策文新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 年。

鄭杰文：《能辯善鬥—中國古代縱橫家論》，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 年。

鄭子瑜：《中國修辭學的變遷》，臺北：書林出版社，1996 年

熊憲光：《戰國策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04 年。

樓宇烈：《王弼集校譯》，臺北：中華書局，2006 年。

聶石樵：《先秦兩漢文學史（上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7 年。

藤田勝久：《史記戰國史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譚家健：《先秦散文藝術新探》，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



期刊論文

江德賢：〈《戰國策》中謀臣策士的辯論方法〉，《景德鎮高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1994年。

李隆獻：〈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論〉，《臺大中文學報》，第33期，頁91-138，2010年12月。

金文舒、金榮權：〈比較《左傳》與《戰國策》的外交辭令〉，《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1992年。

馬玉娥：〈圓型人物和扁平人物——小議《戰國策·蘇秦始將連橫》中的人物塑造〉，《語文學刊》，2009年9月。

許立軒：〈《鬼谷子》「隱真」說服理論在《戰國策》說服的應用〉，《東方人文誌》，9(2)，頁33—58，2010年。

陳彥輝：〈試論春秋官的知識結構〉，《吉林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4月第2期。

曾劍：〈縱橫捭闔巧舌如簧——《戰國策》思想和語言述評〉，《古典文學漫步》，頁184—185，2011年12月。

黃越：〈蘇秦用活攻心術·齊王還歸燕十城〉，《心理世界》，頁59

— 60 —, 1997 年 1 月。

趙楠：〈《戰國策》的時利觀〉，《社會科學家》，第 4 期，2007 年 7 月。



閔秀敏：〈蘇秦“合縱術”的辯證法底蘊〉，《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卷第 2 期，2002 年 6 月。

劉釗：〈戰國策人物塑造藝術談〉，《太原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3 期，2008 年。

饒龍隼：《上古文學制度述考》，〈先秦諸子寓言正義〉290，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三、國外論著

Chang Su-ching , “Three Rhetorical Modes in Pre-Qin Cou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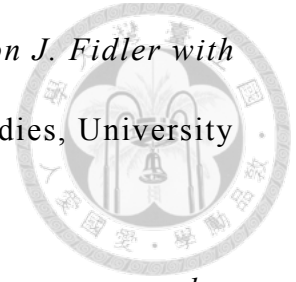
Remonstrance”, *Adressing The Autocrat: The Drama of the Early Chinese Court Discours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March 21, 2009.

Cheng, Anne , *Historia del pensamiento chino*, Barcelona, Ediciones Bellaterra , 2002.

Graham, Angus Charles, *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 La Salle, Ill. : Open Court, 1989.

Crump, J.I., Chan-kuo ts'e :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I. Crump with an index by Sharon J. Fidler with
J.I. Crump* , Ann Arbor :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6.



Crump, J.I., *Legends of the warring states : persuasions, romances, and
stories from Chan-kuo ts'e*, Ann Arbor :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8.

Goldin, Paul Rakita, "Miching Mallecho: The Zhanguoce and Classical
Rhetoric", *Sino- Platonic Papers*, Filadelfia, octubre, 1-27, 1993.

Heisey, D. Ray (2000): *Chinese Perspectives in Rhetoric and
Communication*, Stamford,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0.

Kennedy, George Alexander (1997): "Rhetoric in Ancient China",
*Comparative rhetoric: An Historical and Cross-Cultural
Introduction*, Nueva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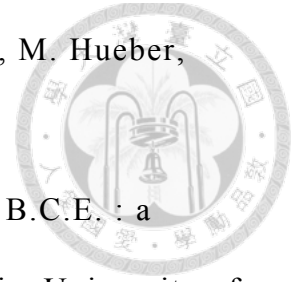
Kirkpatrick, Andy: "China's First Systematic Account of Rhetoric: An
introduction to Chen Kui's Wen Ze" *Rhetorica*, 23, no 2, Berkeley,
primavera, 103-153, 2005.

Lloyd, G.E.R *Las Aspiraciones de la Curiosidad. La comprensión del
mundo en la antigüedad: Grecia y China (traducción de Paula
Olmos)*, Madrid, Siglo XXI, 2008.

López Eire, Antonio, *La Naturaleza Retórica del Lenguaje*, Salamanca,
Logo, 2005.

Lausberg, Heinrich, *Handbuch der literarischen Rhetorik; eine*

Grundlegung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München, M. Hueber,
1960.



Lu Xing, *Rhetoric in ancient China, fifth to third century, B.C.E. : a comparison with classical Greek rhetoric*,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8.

Lu, Xing, “Studies and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Rhetoric in the U. S. A.: Chinese and Western rhetoric in Focus”, *China Media Research*, 2(2), 112-116, 1998.

Mark Leslie Metcalf, *Warring states political rhetoric and the Zhanguo ce persuasions*, Ann Arbor, :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 [Publisher], 2003.

Goldin, Paul Rakita, “Miching Mallecho: The Zhanguoce and Classical Rhetoric”, *Sino- Platonic Papers*, Filadelfia, octubre, 1-27, 1993.

Oliver, Robert, T. (1971): *Communication in Ancient India and China*,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erelman, Ch, *Tratado de la Argumentación*, Madrid, Editorial Gredos, 1989.

W.D. Ross, *Aristotelis Ars Rheto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